



2013 · 搬厂 · 罢工



目 录



前 言	1
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	范世刚 3
吴代表访谈记	23
“很多代表害怕了，不敢再去。我不怕……” ——货仓部员工访谈	60
“老板实在太赖了” ——付组长访谈	63
“我们也控制不了员工的情绪” ——烫金部龚组长访谈	66
“关键是政府也骗我们” ——烫金部工人何大姐访谈	79
“有的代表经常讲要守法，都有点过头了” ——型材部工人姜大哥访谈	82
“员工好有什么用，老板是没良心的老板” ——廖大姐访谈	90
“我们以前两次出来，以为这次也没人管” ——田大姐访谈	103
几个大姐一起说	106
1939-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	谢若林 107

• 关心工人话题 • 关注工人前途

前 言

这起搬厂罢工持续两周多，斗争有所展开；组织者有过一定的讨论策划；期间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谈判；资方和政府部门的打压手法比较复杂，这些，都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访谈，为珠三角工人的集体斗争进程刻下一个印记。

我们访谈了此次 D 厂罢工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人。有最积极，也被迫害最严重的吴代表，有担任组织者和谈判代表的组长，有表现积极或普通的男女普工。

每个人在罢工中的表现不同。哪些人会成为代表，哪些人只是普通参与者，这里有偶然因素，也有必然因素。每个人的工作经历、入厂年限、家庭情况、性格特征、甚至工位特点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罢工中的表现，从而影响罢工进程。

这些访谈记录了他们在罢工中各自的所见所闻、所做所想。其中吴代表的讲述最为详尽，部分内容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有所出入，或存在一些重复的地方，我们都全部照实记下了。这是因为，每个人参与罢工的程度不同，对于事件的了解、态度都各有不同。从他们不同角度的叙述中，可以看出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，他们各自怎么卷入和看待这场罢工，不同的角色如何在行动中影响罢工、在

罢工中自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
工人维权本来就不容易，随着经济再次陷入停滞，难度又加大了。一些工人难免以为自己最惨、工人最不齐心、维权环境最恶劣，以为其他年代和国家地区就不会这样，但其实，这块土地上的劳资纠纷，尤其是罢工的数量，都比别处要高（例如在台湾，工人很少因为裁员、减薪起而抗争），并且就像第一篇分析所讲的：“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。”

附录《1939-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》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参照：六、七十年前的上海工人有过怎样的群体经历，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，意识、组织和斗争水平如何。不难看出，当年的斗争要尖锐、残酷得多，工人所受的磨难更为深重。但斗争的本质一样，工人、老板、政府的许多表现也是相通的。

2015年的珠三角，劳资纠纷在持续增加。这本小册子，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工人，提供一个参考，少走弯路。



珠三角 2013 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

范世刚

背景

2005 年，广东省政府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做了整体规划，工厂搬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，省政府开始加快推进经济调整政策，计划在 2012 年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。2011 年底，深圳市出台了细化措施，要在 5 年内搬迁上万家企业。各级政府的准备工作到 2012 年基本完成。2013 年，政府主导、配合下的工厂搬迁集中出现了。

经济形势的变迁已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。许多工厂都在调整经营策略，包括把厂搬到工资更低，或能享受更多优惠的地方去。对这些工厂来说，搬迁是主动选择，或顺理成章的事，并非只是被动执行国家政策。有一些搬迁工厂还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便利和补贴。

在珠三角，工厂搬迁一直是劳资纠纷的重要原因。2013 年的搬厂潮同样伴随着大量罢工。焦点之一，是经济补偿问题。

不是所有搬迁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，也不是所有的搬厂罢工都那么艰难。有个女工回忆说：“我们厂搬的时候，老板主动赔钱了喔，而且是按照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喔。”另一个女工说：“我有一个老乡，她那个厂要搬的时候，老板开始不给赔。后来他们把厂门堵住啦，不到两天，老板就同意赔钱啦。听说那个老板早就把钱准

备好了，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，看工人闹就给，不闹就不给啦。”

可是还有很多老板，虽说没有拖欠工资，但补偿款是一分也不想给。他们最讨厌工人“得寸进尺”。有时候，企业实力越是雄厚，老板就越是寸步不让。这些老板的名言——“拿出一千万来拖垮工人”，“宁肯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一分钱”——激怒了工人，迫使工人的行动升级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工人一定想要这笔钱，而且能够坚持罢工呢？

首先，长期的经济繁荣、近几年的工资增长和珠三角工人群体的生活演变，都使工人有了更多的需求。2008年经济危机后，各地冻结工资标准；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，许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同时，物价也涨得厉害。最近五年，珠三角的底薪连年上调，但每次底薪上调都伴随着新一轮房租、物价的攀升。

其次，20多年来珠三角工业的巨大发展，造就了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，聚集了上千万的工人群体，也产生了无数的劳资纠纷。各种集体和个人维权经验（包括停工、堵路、堵厂门、拉电闸、投诉、仲裁、找媒体、打官司等）也在工人中扩散着，使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后果、资方和政府的应对，以及法律法规（包括可在搬厂等劳动合同条件变更时要求经济补偿），都有所了解。2013年的一次罢工中，某派出所警察说：“你们这些工人都成精了，（维权的时候）动不动就报警找政府。”

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，工人被压得抬不起头，却也加大了随后集体行动的爆发力度，就像往后退一步，再加速冲刺一样。2010年后，要求加薪的罢工一时间遍及珠三角，在汽车行业尤其明显，着实让老板和国家紧张了一把。回忆四年前的某次加薪罢工时，某个汽车厂男工感慨道：“哇，那感觉就像是整整过了一个时代。以前每年涨十块钱的（月）工资，现在听说有的厂罢工后一下子涨了七八百。怎么说呢，大家都蠢蠢欲动起来，那个心兴奋得不得了。”

另一方面，虽然这些年工人积累了一些见识，但是在繁荣时期，习惯“大不了换家厂”、没有经历严酷冲突的工人，一般还缺乏抗争毅力。同时，老板们忙着赚钱，并不如临大敌一般对付罢工。



此外，除了上调底薪，珠三角政府部门也广泛介入罢工调停，避免工潮扩散。国家虽然不会随便为某个老板出头，但整体上总是站在老板一边，经常敷衍、欺骗和压制工人，必要时还会动动拳脚。

凡此种种，使罢工的深度和广度一直水平较低。

绵延至今的搬厂罢工潮，有些斗争的时间长，过程复杂，冲突相对激烈。工人们尝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，也在面临更大的考验。

D 厂的罢工简析

罢工概况和劳资对抗的动力

珠三角某市 D 厂是一家老牌港资厂，实力雄厚。2004 年，赚了大钱的老板在邻近的 Z 市买了块儿地皮，自建分厂。老厂规模不断缩小，但是订单一直充足。有些工艺复杂的产品，只能靠老厂的员工来做。所以，工人很了解厂里的经营变化。

2013 年开工不久后，D 厂老板打算把老厂进一步合并到分厂去。随后，因为搬迁赔偿问题，发生了几百名员工参与的全厂罢工。老板不肯就范，工人也不愿放弃。二十几天中，工人三次“扣留”资

方车辆，一次在厂门口堵路，两次围堵工厂办公楼，两次在街道办外静坐抗议，一次围堵劳动站，两次在工厂附近示威，一次游行去市政府上访。其间政府四次出动防暴警察，工人两次被全体抓进派出所。最后，去市府上访的路上，工人被警方“修理”了一顿。部分工人被抓后关了几天，罢工瓦解了。

“罢工好辛苦的，比上班还要累喔。”一个大姐这样说。“哎呀，真的，你没看到，那天他们好像土匪一样喔！”另一个大姐讲起上访途中被打的情形，依然气愤难平。

持续的对抗让 D 厂工人身心俱疲。最后，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，紧张兴奋的工人一下子被“打醒”了：他们没了主意，害怕了，退却了。

工人事先都没想到罢工“会搞这么久”。一个谈判代表说，最初估计罢工不会超过 7 天。不少工人听过或见过其他厂的罢工，多少有点心理准备。他们觉得，只要不是被逼到仲裁打官司，事情就不会拖太久。

那么，为什么在这次罢工中，工人跟老板斗得那么久，斗得还挺凶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劳资双方积累的“宿怨”。

D 厂的老工会提起大老板的“江湖”出身，也记得多年前大老板在车间巡视，如何亲手殴打“犯规”的工人。在大老板的纵容下，那些年厂里的保安也很嚣张，动辄打人。2006 年后，大老板的弟弟二老板开始接手厂里的管理。此后虽然打人的事情少了，但是管理开始“正规化”，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规矩越来越多，罚款越来越多。二老板像他哥哥一样，喜欢亲自上阵，没少闻车间厕所的臭味——他经常神出鬼没地“抓捕”躲在厕所吸烟的工人。2007 年，老板取消了全勤奖。2008 年，工资上调至 900 元，不再包吃，而且无论是否在食堂用餐，每月都要扣除 270 元的餐费。



2012年，取消了年终奖。

在珠三角的搬厂罢工事件中，“积怨爆发”是很常见的。例如：

成立 20 多年的某台资玩具厂，发了大财，老板投资广泛。但工人常年工作在充满有毒化学品的环境中，至少有 5 名工人死于职业病，是名符其实的“卖命”。对于被诊断为职业中毒的工人，资方一概不理。此外，该厂加班费不合法，只要工人计件赚多了，就下调单价。还发生过两名男工因加班过多、不能请假而跳楼自杀的惨剧。2008 年，这家玩具厂开始为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，但是很多工人超龄，不能再买社保了。

由于担心失去工作，老员工们平时比较谨慎，即便发生罢工，也不太敢出头，甚至不会参与。但是搬厂时，再消极的老员工也不怕跟老板撕破脸了。

除了“宿怨”，一些老板拒不赔偿的死硬态度和对工人的耍弄，也是罢工持续的重要原因。

就 D 厂来说，工人很清楚老板完全有能力支付补偿。罢工期间，有传言说老板要拿出 1000 万来“玩死”工人，让大家更加愤怒，坚定了要到补偿的决心。

无独有偶。2013 年 8 月，珠三角一家纺织厂决定撤销某部门。资方宣称“把钱丢到河里”也不给工人补偿，工人的口号针锋相对：“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。”

上文提到的那家台资玩具厂，2013 年 5 月，在转移机器后，派了个律师通知工人“企业即日倒闭，工人须当日办理工资结清手续”。满肚子怨气的几百工人，随即到区、市政府上访，还与防暴警察在

国道上对峙。

有的老板在工人面前像个笑面虎，很会迷惑人。2013年珠三角某上市公司旗下钣金厂，发生了搬迁补偿纠纷。事后一名男工说：“我们罢工后，老板娘又说两年内不搬了。她人看着很亲切，说话很和蔼，我们就信她。谁知道后来还是一台一台地搬机器，我们越来越火大。到最后，要不到钱也要争口气。”

这些老板时而凶神恶煞，时而亲切动人，但就是不想掏钱。D厂的一个组长说：“工人是弱势，本应该工人耍无赖，怎么反倒成了老板耍无赖？”

工人是否“弱势”暂且不管，但是应该说，资方“耍无赖”，是因为老板认定：“工厂是我的财产，厂里一切我说了算，我赚多少钱、搬哪里去都是我的事，跟你们工人没关系！工人要我掏钱，纯粹就是找我麻烦。”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人打发掉。工人则认为，工厂要搬了，是时候跟老板算算账了。正是这些死硬的老板，让冲突变得复杂起来。



罢工准备

D厂工人早就开始讨论搬厂的事情了。组长们也密切注意工厂生产的变化，比如采购计划的变动、订单的外发和机器设备的转移计划等等。组长互通有无，同时也向关心补偿问题的老员工“泄露情报”。这样，就出现了以各组组长为核心的维权小圈子。

对于D厂的大部分员工来讲，不愿意跟着搬厂，主要是不想挪

地方。在一个地方做久了，亲戚朋友都在，挪了地方一切从头开始。就算去新厂有更好的位置、甚至多一点补贴，也有很多人不愿去。至于管理层，分厂已经有完整的管理架构，老厂的管理过去了，地位尴尬。而且管理层普遍工资高、工龄长，能拿一笔不小的搬迁补偿，所以，D厂管理策划“闹事”是不奇怪的。

在老板搬过几次机器之后，组长开了个小会，一是统一诉求，二是确定发动时机。大家决定要在下次机器装上车的时候开始罢工，同时各部门拉闸断电，让犹豫不决的人“心安理得”地离开产线。

不久，员工和基层管理又开了一次扩大会议。为了防止泄密，组长们只叫了一些可靠的工人来开会。大家被告知：“有人要挑头了，愿意参加的就来开会。”会上根据某管理人员提供的“情报”，决定在三天后资方搬注塑机的时候拦车罢工。大伙还挑出20来个人做联络员，分头收取“罢工基金”，预备饮水和交通的花销，此外他们还要协调各部门的行动。

D厂某些高管显然知道工人们在“搞事”，但却装聋作哑。二老板及其个别亲信，则一直蒙在鼓里。严格来讲，这并不是因为工人“保密”工作做得好，而是二老板治厂无方，失去了管理层的支持，没能提前“解决”带头闹事的人。与D厂不同，有些预先做了安排的老板，搬厂就顺利多了。比如一家港资厂，老板逼迫老员工和基层管理自离，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下手：赔钱辞退经理，从外地调来新管理，把老厂的干部调走，等等。最终，保证了这家厂没赔工人钱就搬走了。

目前，不少搬厂罢工都是基层管理发起的。为了切身利益，基层管理往往比员工更能挑头维权。但是一旦投入行动，基层管理也容易摇摆不定，怕得罪老板，而且习惯于单方面发号施令，不利于普通工人积极思考和行动，妨碍罢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。

罢工初期工人的决心

“扩大会议”召开后不久，厂里又开始搬机器了。当注塑机被装上老板租来的平板车时，一名货仓部工人用叉车拦住了平板车的去路。罢工开始了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资方和政府部门显然错误估计了工人的决心，只想敷衍了事。罢工发生后，厂里先是要工人回去干活，但没人理会，于是搬出桌子，让罢工工人签辞工书，结工资走人，还是没人理会（除了几个临时工之外）。紧接着，来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警察，凶巴巴地吓唬工人，没成想被工人围着骂，吓得躲进办公楼。不久，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，跟工人代表攀起了老乡关系，但工人态度冷淡。隔天，十来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厂门口晃悠了一阵又消失了。到第三天，大老板露面了，当着全厂工人的面前说不搬了，让工人回去上班。一个大姐说，当时大家都不信他，喊得好心齐：“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！”大老板见势不妙，抬腿就走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工人一度士气高涨。看到工人的决心，老板和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了。

罢工第七天，资方与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。上午的谈判虽然没什么结果，但工人代表觉得“还算正常”。到了下午，资方突然翻脸了。谈判室里新安装了录像设备，等工人代表一进屋，二老板就拿起一张纸“通知”工人：搬迁取消，要求工人立即复工，否则按旷工处理，并且要求工人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。跑来帮工人维权的律师见状，什么都没说，立马就走了。随后，工人代表退场，向等待谈判结果的工友们说明了情况。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出厂门，堵住了厂门口的一条马路。很快，大批的防暴人员赶到，强行把工人赶回了工厂。冲突中一名中年女工摔断了胳膊。

这次事情之后，有几个组长不愿再做代表了。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更生气了，马上又从员工中选出了新的代表。事后第二天，工人集体到街道办静坐，要求政府做主。

很快，工人们就遇到了更大的考验。



放车和堵路

大家还记得，D厂罢工第一天，不仅机器没拉走，老板租来的平板车也被工人留在了厂里。有的人说租金是5000块一天，也有人说是9000块一天。5000也好，9000也罢，老板希望工人能尽快把车放掉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。

第一次谈判破裂后，工人到街道办外静坐，很快资方就同意了进行第二次谈判。谈判时，资方律师代表老板表态，说同意赔钱了，剩下的就是对赔偿数额进行协商。他们提出的数额是每人每年工龄补300块，后来请示老板，加到400，接着500，但是距离工人的要求还是太远。代表们提出要2000（底线是1600块）。律师声称，老板已经拿出了诚意，同意再谈，要求工人也拿出诚意来，也就是把车放掉。为了打消工人的顾虑，政府部门也出面作保，承诺一定会帮助工人解决问题，同时要求工人先把车放掉。工人代表产生了分歧，但很快就统一了意见，当场表示同意放车。谈判结束后，代表们向工人通报谈判进度，并劝说大家放掉车辆。工人中间同样出现了分歧，但是反对放车的人除了抱怨，并没有阻拦车辆放行。当天晚上，扣留在厂里9天的平板车终于开走了。

事后，某工人代表说他当时同意放车，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誓旦

且地书面承诺会帮工人到底，而且他也觉得工人应该表现出诚意。但也有代表从未考虑过“释放善意”，只是害怕“不识抬举”会惹毛政府，担心“政府不帮我们了怎么办”。

放车的时候，现场只有一百来个工人。据一个中年女工回忆，谈判那天她身体不舒服，回家比较早，等到第二天去厂里的时候，发现车不见了。她忙问其他工友是怎么回事，这才知道车已经被放走了。她说，如果当时她在现场，就是躺在地上也不会让车开走。

果然，车一走，老板就翻脸了。再次谈判时，只有资方律师露面，改口说不搬了，让工人回去上班。工人情绪很激动，有人开始骂工人代表。一部分工人留下来“看住”律师，另外一百多人去“围”街道办，结果全被“请”进了派出所，在操场上罚站了几个小时，最后把公安买给辅警的盒饭“抢”来吃了，稍微出了口气。

从这之后，直到罢工失败，工人们再也没见过老板。后来，有的代表也后悔当时把车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坚持扣车百分之百可以迫使资方就范吗？让我们看看另一场罢工。

2013年冬季的一天，珠三角某电子厂搬迁，随后工人罢工，抗议老板不给经济补偿。罢工工人封堵了仓库，阻止资方出货。第二天深夜，守在工厂里的近百名工人突然被防暴警察袭击，多名工人被打伤打晕，还有多名工人被抓。打跑工人后，资方开始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出货。但是，该电子厂的工人并没有屈服，第二天还集体去市政府上访，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与资方进行了谈判。老板敷衍了事地抛出了一个每年工龄补400元的方案后，单方面终止了协商，还要求工人立刻回厂上班。同时，警察继续抓

人，甚至到工人的出租屋搜查。工人新选的代表，也被政府部门“请”去谈话，并被强迫签字，保证不再参与集体维权。

对照这个案例来看，如果D厂工人当时坚持不放车，很难说不会提前被“修理”。问题的关键，并不在于是否使用某种维权手段，而在于工人对于“要不要做”和“怎么做”的集体参与讨论的过程。对D厂工人来说，稀里糊涂地把车放了，确实让自己陷入被动。但是如果反对放车的那部分工人，只是简单地阻拦，那也等于在老板和政府面前，公开内讧，同样让自己陷入被动。假设在放车前，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决定，至少能有机会共同进退，比匆匆放车或直接内讧，要好得多。

如果说放车是工人内部第一个严重分歧，第二个分歧则是围绕是否堵路产生的。

在罢工的第一天，就已经有工人喊着要堵路，游行示威，去市政府上访。据几个代表说，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喊着要去堵路。代表则反复告诫工人要“理性维权”，不要过激。

在第一次谈判破裂之前，代表还能约束工人。虽然几个天天喊着要上街的工人经常说代表“胆小怕事”，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响应“激进派”的号召。

代表的想法比较复杂。他们告诫工人要“理性维权”，但私下里也谈到亲眼见过某厂工人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，“那些汽车从路口一直被堵到万联商场”，结果老板马上就按照工人的要求支付了补偿款。

说到底，代表们是害怕被扣上煽动工人“闹事”的罪名，但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工人不“闹”，就算代表的嘴皮子再厉害，也休想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。

回想当初，一个代表说：“只有最后那一天的工人行动，代表们没有掌控得到。”

“最后那一天”，就是工人集体游行去市政府上访的那一天，就是工人们徒步三个多小时后，在公路的僻静处被防暴警察殴打抓走的那一天，就是罢工失败的那一天。至于“掌控”，那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集体“闹事”都是代表们暗中策划的。不仅如此，工人们“过



激”行动，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，但是他们对工人“闹事”的后果也有个大致判断。所以，在罢工的最后一天，当有工人喊“走，大伙去市政府吃饭啦”的时候，当工人们要求代表一同去游行的时候，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代表就躲开了。一个代表对工人暗示说：“这次

去可能没有饭吃。”还有个代表后来说，当时他要求工人站成五人一排的队伍，整整齐齐列队前进，如果能做到，他就跟着去。当然，这恐怕只是他躲开的借口。

珠三角的工人一直“偏爱”堵路这种手段，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，上街堵路快速有效，而且基本不受惩罚。

一位工人回忆说，当初他们罢工上访，劳动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被工人纠缠得烦不胜烦的时候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！都说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。要是解决不了，到时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堵路，上访，随你们便。”

另一位工人回忆另一场罢工，他记得当时派出所某警察说：“你们堵马路不要堵完。堵一半，这样就没事。”

而在 D 厂的罢工中，工人在街道办外静坐时，每个人的手机都

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两条短信，一条是《信访条例》中的某个规定，另一条“让我们不要堵这个，不要堵那个的，说要拘留 5 到 10 天”。不过，很多工人对于拘留几天这种事见怪不怪，已经不拿它当回事。

但是工人“堵路没事”的预想落空了。最后一天挨打时的恐怖和随后的处罚，都出乎工人的意料。

代表的产生、监督和保护

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。珠三角的很多罢工，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。

比如说，2014 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。消息传到车间后，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：“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，大家不要做了！”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，资方出来道歉，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。工人很不满，冲出厂门堵路。很快，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，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。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“发动”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——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。

那么 D 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？罢工开始后，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，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，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。实际上，罢工的当天下午，工人就选出了代表。过程也很简单。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，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，有人问大伙：“他们做代表，大家同不同意？”一致通过。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。

D 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，当了代表，却对工人说：“(要是政府问起,) 不要说谁是代表，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。”但是，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，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。

几个大姐回忆说：“他们（政府）让我们选代表，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，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，代表们拿钱跑掉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呀。”

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，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，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害怕老板报复，代表之间商量好，租一辆车，等赔钱的那一天，代表先拿钱，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。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，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。

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，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，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。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一个大姐说：“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，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，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，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！”

担心归担心，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，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，该怎么办。同时，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。

在D厂罢工中，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，成天骂代表“胆小怕事”。罢工最后一天，对于代表们的“贪生怕死”，一些女工很生气，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“汉奸”，是“叛徒”，“赔了钱没有他的份”。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，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，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。这一点，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。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，代表们被抓以后，很多工人怕了，拿了钱就走了。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：“我们还后悔呢，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，害了他（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）。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，以为这次也没人管。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，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，都没人管，这次不

知道为什么会抓人。……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，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……。”

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。有些工人非常害怕，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。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，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。当时的情况，代表不是被抓，就是缩了回去，没有人出来组织。结果，一两天之内，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。

趁着工人被打垮，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，同时“请”其他工人回厂上班。对不愿意复工的人，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。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。但是，让工人意外的是，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，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。



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，这个“一年零九天”破了纪录。

被释放后，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。他认为：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；代表不是组织者，这一点与“工人领袖”不同；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，联络，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，这样“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”。当然，他认

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。

不过，在 D 厂案例中，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、联络的任务，最初的代表，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。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。换句话说，在这场斗争中，他们是事实上的“工人领袖”。此外，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，不可能只是机械地“背诵”工人的要求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，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，就不得不加强组织。工人代表也好，谈判代表也好，积极分子也好，不管叫什么名字，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，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。就算代表处处“遵纪守法”，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“释放善意”，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，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。

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

上面说了，在罢工中，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。最后一天，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，想把“那些人”（指躲开的代表们）骂出来的时候，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。老吴说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自己虽然也担心（镇压），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，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。后来在上访途中，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，高喊“快！就是他！”，紧接着一群“黑皮”就冲了过去。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，但刚刚还“骂人”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，试图阻止警察抓人。

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，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“女孩子”的表现时说：“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，女孩子冲在最前面。去市里那天，打人、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。我们都说，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，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，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。”

至今为止，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“斗”，但却多

少做了挨打的准备。罢工时，女工往往冲在前面，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。这种时候，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“怕死”，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：男工往前“冲”更容易挨打；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。

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，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，没啥用。实际上，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“冲动”推动了罢工的发展。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，立即往后缩了。

有人害怕，但是也有“不怕事”的顶上来。第一次谈判破裂后，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，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，很多工人都认识他。后来食堂外包，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。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，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，他主动站了出来，要求做代表，还说“我不怕”。

还有一个中年男工，虽然不是代表，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。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。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，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，关押了一个多礼拜。放出来后，因为没人继续组织，他也没了主意，否则“要是有人组织，我还跟着干”。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，他感觉“自己就像根棍子”，代表们指哪儿，他就打哪儿。

有积极的，自然也有不积极的。D厂罢工后，有些工人去找事做，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。对于积极的人来说，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。吴代表说，开始几天，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，后来就懈怠了，开会人都凑不齐。

政府的态度

政府的处置手法，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，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，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

总的来讲，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，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。有些案例中，对于“不知好歹”（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、补偿）的工人，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，包括拖延、推诿、欺骗、恐吓，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。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，政府就恼火了，瞬间露出几颗獠牙，咬工人两口；但也很会拿捏分寸，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，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。

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，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，就遭到暴打，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。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，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，回到厂里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，“兵败如山倒”，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。在不同的罢工之中，政府如何把握“最后出手”的时机？这个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要指出，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，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，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，分出轻重缓急，避免手忙脚乱，四处出击。



D厂罢工后，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，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，两种手法都无效了，就开始拖延。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“巡视”，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，还对工人“理性维权”大大称赞，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。可是工人不傻，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，所以没人当回事，听多了还反感。

第一次谈判的下午，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。老板不

承认搬厂，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，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，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。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，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。工人并没有害怕，回到厂里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。

第二次谈判时，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，同时要求工人放车。到了第三次谈判，老板却不再露面，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，说“你们的老板太赖了，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”。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，这个不得而知。但是工人们知道，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，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；在利益问题上，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。

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，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。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，国家频频出手，一是压制工人诉求，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，帮助老板渡过经济“寒冬”，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，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，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。还有一点也很明显，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，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，因为工人以“轻快”的心态投入罢工，组织水平、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，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，只需敷衍一下，忽悠一下，拖两下，打两下，再哄一下，也就都解决了。

结 语

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，状况如何？有的进了新厂，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，有的暂时回老家，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，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。总之，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。毕竟好工作不好找，烂工作一大把，而且这些年来，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。

近几年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，以便早日走出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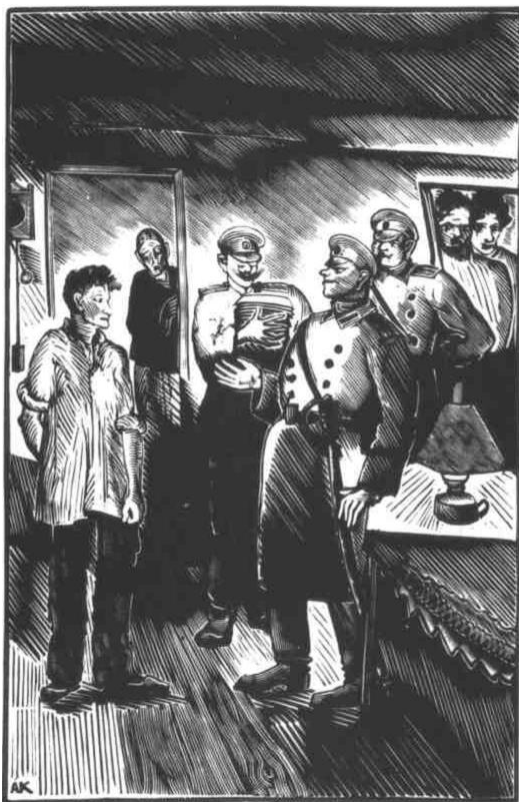
条。搬厂罢工潮，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。工潮延续了多年来“就事论事”的特点，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。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，比如堵路、集体上访，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，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。

整体上，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，有需要的话，也不怕突破法律，采取堵路、阻拦出货、集体上访等手段。这些手段，好用的话，工人就用；不好用的话，先暂时搁置起来。就算被打了，被抓了，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，愤怒一阵，就过去了，谈不上被吓破了胆，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。

无论搬厂罢工，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，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。但是工人行动起来，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“神圣不可侵犯”的东西。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，就敢想敢干。可以说，目前的工人处于“不愿违法，不怕违法”的矛盾心理中。这并不奇怪，单抠条文的话，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，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（破坏生产，损害财产，破坏公共秩序，寻衅滋事，等等）。只不过一直以来，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。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，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，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。此外，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，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，反而可能刺激工人，让局面复杂化。对此，政府心中有数。

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，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，比过去更有自信，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。工人想得到更多，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。国家是全副武装的，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，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。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，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，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？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，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？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

来？总之，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？还要拭目以待。



吴代表访谈记

一、工厂基本情况

● 工人状况与劳动条件

2004年这家工厂在厂门口招聘，我就这样进了厂。暂住证厂里给办，但要员工出钱。厂里不预支工资。工人的工资还要压2个月。这家厂货源充足，每天都有事做，两班倒。除了周日，每天都加班，基本没休息，做得很累。无故不加班的话算旷工，当天工资不给，还要罚3天工资。赶货的时候会通宵，错峰用电时可以休息，但是休息日没有任何工资。平时请假要组长和主管几个人批。

我们两公婆都在这家厂，吃住都在一起，有个照应。当时我们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怎么样。

我被分到开料部，做相片架和相片框。开料部有50多人，还有十几个杂工，负责码料、捡料，此外还有计数、调机、质检和机修。

组长每半个月派一次单，看哪些急，就先做。说是计件，其实是计时又计件。厂里规定了基本产量，还有一份基本的价格表，但要在规定时间完成，否则挣得更少。你工资多少，看上头给你安排的活好做不好，这要看关系，有明显的亲疏。好搞的模材，推下去就是完整的好几根，做得就快一点，工资高一点。有的模料，有宽有窄，要反复推几次，还要修边，花同样时间，出的活少，赚钱少。

计数计算产量只是大致估计。开料比较粗，然后还要出条，四面刨。

单价是老板乱订的，不考虑产量，其实是假的，原则是一天不许多于 60 元。月工资七八百，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别不会超过二三十元（附近工厂的工资都差不多）。

我们线上工人的计件收入，每个人扯平了，分一部分给杂工、计数和调机，他们的工资是直接我们从计件的收入里划出去的，不是老板另外开工资。

车间里面，都是亲戚套亲戚。管理安排自己人做计数岗位，做师傅。有个主管和助理是四川的，是连襟，娶的老婆是亲姐妹，助理下面包括计数、QC（质检）、码料，都是亲戚，打也打不赢。质检和计数比我们工资高一两百。两个有关系的调机师傅，一般不做事，在办公室里喝茶谈天。平时我开料也没啥要问师傅的，认识卷尺，知道怎么调档位就行，半天就学会了。被照顾的工人可以提前下班，完成定额就能轻松回家，不用再加四个小时班。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照顾。工人在厂里一般都会形成小团体。

年终奖早先是有的，按工龄，每年加一百，六百封顶。2008 年没发年终奖，2010 年以后都不再发了。当时工友也议论，但是没人闹。因为年终奖没写进合同里，老板想给就给，不给也不违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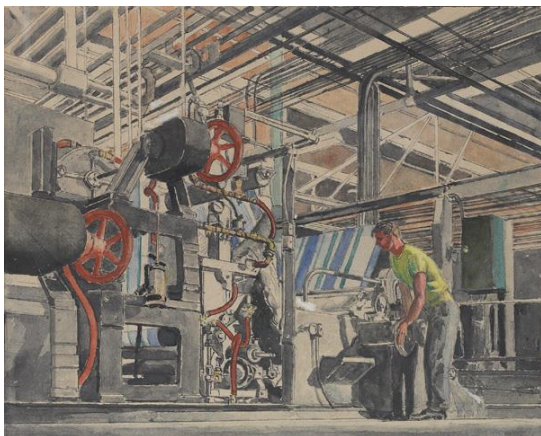
没打卡要罚款。把料开坏的话，一般不罚款，因为一般不会上报，上报的话，管理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所以直接就在车间处理了。

赶货的时候，厂里用过凉山彝族工人，干了几个月。他们工资比一般员工低，还要交一部分给他们内部的领头。彝族老板委托自己的亲戚，在厂里看着。彝族工人各部门打散，年轻的普通话还好，年老的没读过书，不会说。彝族工人要请假，需要向厂里和内部头头同时申请。厂里把工资发给他们带头的，带头的再发给普通员工，比我们一小时少一两块钱。

我们厂给沃尔玛供货。每年沃尔玛验厂的时候，厂里教工人怎样回答，答得好的话给两百。我从没被抽到过。原来我们厂每年都

要招一些童工，各部门都有。童工是未满十六岁的，15岁左右的，哪里人都有，包括四川彝族。验厂时厂里把童工赶回去，不用上班。

2007年家私部正规化，分成三四个部门，每周休息一天，计时，平时不加班，赶货时加班四个小时，加班费按正规计算。厂里剩余的几个部门也跟着都改为新制度。底薪提了一点，感觉工资有所提高，工人很高兴。



调机工一般在车间里看着，负责两台机，拿1140元，包括300多的技术津贴。发工资按花名册，签字后直接打卡。

我后来做了调机师傅，跟那些组长也混熟了，有时喝喝酒，每人出个二三十块，加深感情。我这个人责任心比较大，调试机器很认真，尽量避免出废品。

另有工程部，负责修机器。工程部的修机师傅，那时候工资就有四五千块，能修大的平板机。

我们厂一般旺季是6-10月，每天加四个小时，有时通宵。其余是淡季，正常加班的话，有1700元左右。调机师傅要跟着加班。我当时没想离厂，这里多一个津贴，轻松，人际关系也好，所以不想走。家私部的管理是从东莞一家倒闭的家私厂招来的一整套班子。我没什么当管理的机会。

● 管理层

我们大老板90年代就来大陆开厂了。听说他们家原来是文革时期偷渡去的香港，然后回来投资，现在五六十岁了。他有老婆，没

小孩，平时不露面。他喜欢玩，过年搞个演唱会，中秋节请个乐团。大老板 2006 年去了惠州，这里的厂就交给他弟弟管理。厂里香港的管理人员很少，都在高层。

二老板从不给工人好脸色。工人在厂里抽烟，罚款两百，半个月不许加班。一年总有几个倒霉的被抓住。厂里有摄像头，主要是监视我们在做事还是聊天。

厂里的管理一般是内部培养。我表哥原来是普工，跟主管一起打麻将，吃吃喝喝，杀只鸡，把主管叫来喝酒，就这样当了组长。组长都有个小办公室，工资比我们多一两百。组长上边还有助理、主管和经理。

● 社保和工伤

社保是自愿购买，不买的签字放弃。一百个工人里只有两三个买了养老保险，多数管理也没买，说不长做，又要买那么多年啊，谁买得起呀。

厂里强制买了工伤保险。工人进厂要体检抽血，每年还要交 35 元体检费，但厂里从不给员工体检结果，只给一个健康证。收钱是真的，体检是假的。在我们开料部，电机带动锯片，工人把原料推过去，不留心会伤到手，主要是手指。这种事很多，每年都有。住院有基本工资，生活费一天 12 元。我受伤时技术津贴没给，只给基本工资。当时我住的病房里，有好几个其他厂的工友，老板都不管他们，我还觉得自己幸运多了，医药费给报了。

厂里工人流动性较大，所以一年四季都招工。我们是劳动密集型，不需要什么技术，培训一下就可以做。但是年轻人呆不住。工作环境比较差，啤机温



度高，开料灰尘大，每天要换几个口罩，年轻人不习惯戴。平时工人不找厂里要，他也不主动给。需要戴耳塞，年轻人也不习惯，不愿戴。车间使用二甲苯，需要通风，戴口罩。但工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差，我跟他们说，他们认为这都是多余的。工作中手指受伤常有，更重的伤没有。

● 环境、食宿和福利

一些工人在厂外租铁皮房，每月 50 元。那时候这里有很多铁皮房，又潮又热。我第一次租的是楼房，170 元每月，太贵了。那时旅馆都没有多少，礼拜六礼拜天去晚了都没房开。打麻将都没地方去。录像厅比较多。

之前在食堂吃饭不扣钱。伙食不咋样，豆腐豆芽，南瓜冬瓜都不削皮，沙子、蟑螂是肯定有的。菜里的肉用打肉机打得稀烂，我们都说打成肉分子了。因为免费，我们还是吃。从 2008 年开始收伙食费，要员工签字，好多人不愿签。管理人员先动员亲戚签字，不签字的结工资走人。少数人没签，走了。我签了，因为那段时间我老婆回家，我一个人懒得做饭。

原来我们厂还有福利，一个月一小袋洗衣粉、两卷卫生纸，每个礼拜一个水果，后来被二老板的秘书取消了。

2004 年到 2005 年，厂里有两千多人。年饭时有抽奖，两年工龄的员工才能参加。奖品有彩电、自行车、手机，是供应商送来的礼品。2006 年以后就不吃年饭了。

● 保安

过去我们厂几乎每月都出一次事，在派出所都挂号了。

据说老板年轻时就喜欢打打杀杀。那时厂里除了保安，还组建了厂内防暴队。参加的员工每个月多发一百元，武装了钢管，厂里出现打架的，防暴队要来维持秩序。

我跟保安吵过架。有一次下班，很累，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



队，很乱。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。我说你骂谁呀，老子长老子短的，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？他就要打我。我们人多，把他扭倒了。

保安打人，有的是故意找茬，有的是帮朋友打架。管理人员之间也打架，管理人员跟工人也打架，保安跟管理人员也打架，但一般都是保安打员工。

保安队长有两次被打。大年三十上街打麻将，在厂门外几个湖南人找厂里的管理人员闹事，队长出面调解，被一砖头打破头。第二次厂里安徽人打架，保安队长也是安徽的，出面调解，腿被老乡砍了三四刀。

有个保安是保安队长的兄弟。打饭的时候挤，这个保安的老婆说有个贵州的员工抓她屁股，保安听说了，就找那个贵州的员工。厂里有个管理人员是贵州的，出来替那个员工说话，说保安没有真凭实据。然后几个保安把他们两个打得住院。老板给赔了一点钱。这个管理自己也没脸面，就走了。

2008年厂里的保安全部换了，保安队长也走了。厂里不再让队长直接招人，过去都是招亲戚。原来保安归老板直属，后来归行政部，这以后保安就变老实了，不再出现打架的情况。

从2006年到2013年，厂里一直在往惠州搬机器，今天搬一台，明天搬一台。2006年惠州开分厂后，老厂的一千多人，慢慢压缩到三百多人。

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，春节提前放假。那时好久都不加班，有时没事做，扫地、打杂，在厂里玩，开基本工资。

二、2006年第一次搬厂

2004年大老板在惠州买了地皮，建起了厂房。2006年，老板把一些部门搬了过去。厂里也不问工人愿不愿意去，直接让外住的工人带上行李跟车一起走。开料部工人不愿去，围了办公室，问经理搬厂是不是老板的意思。经理说是，还宣布不愿去的放一个月假，因为机器已经打包了。

当时我们对法律和策略一窍不通。我们部门三十多人找过镇上的劳动站。拿主意的几个工人都是些有主见、说话说得开的工人。劳动站的人先是劝我们跟着去惠州，后来答应来厂里帮我们解决问题。他们来了两三个人，进了老板办公室，出来就说老板不在，要我们安心等几天，要相信政府。那时我们不知道有搬迁补偿金这回事，只要求结工资，但是老板要我们跟着去惠州。

后来搬的部门越来越多，人越聚越多。大家在厂里等了十多天，看着搬厂，有时一起去劳动站问一下。大家担心的是拿不到工资。经理对我们理都不理。当时没人闹事，很安静，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了。劳动站的人又来了一次，跟老板谈完，出来叫代表进去。劳动站的人在场，老板让员工写辞工书，写的就结工资走人。代表进去了四五个人，包括我。因为我比较活跃，有的工友说让我去。

开料部50多人，20多个去了惠州，最后剩下5个人没走。老板是跟各部门分别谈的，也不是同一天，各部门搬也不是同一天，这样让员工也比较零散，不能一起提要求。当时我们也不懂得各部门联系，都是单打独斗。

其实老板早就打算在厂里开个家私部，但一直没说。只是搬厂的时候，老板找了一个外地家私厂的人来我们厂里，不知道干什么。等人分流得差不多了，老板说家私部需要人，让我们留下。惠州新厂偏僻，招不到人。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，心里就有一团火，

觉得被坑了，被老板骗了，窝囊，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，不知道怎么发火。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，也没人帮我们。

新成立的家私部做珠宝柜子出口。我去了还是开料，后来当了调机师傅，比普通工多一个技术津贴。当时东莞有个家私厂，老板跑了，员工连搞三天，堵了路，要工资。镇政府卖了厂房、机器，给工人发了工资。我们老板认识那边的一个经理，让他把工人都带过来。那个厂有些工人已经找到工作了，我们老板叫他们直接自离到这里上班，先给他们发两个月工资。我们厂家私部的机器大部分是从台湾买来的，都是新的。

三、个人维权

2007年我调机时手受了伤，在病房遇到公益机构发法律宣传资料，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，就聊了一会，觉得可以啊，以前没遇到这样的组织。后来我就开始学法律，学怎么算工资，怎么辞工。原来以为辞工要找老大批，工资是老板怎么给就怎么算，学了才知道有 21.75 天 / 月标准劳动时间，怎么算加班费，等等。

2012年，我开始个人维权。第一次投诉的问题包括：食堂吃不吃都扣钱（每月 270 元）、不发工资条、使用童工、没买养老保险。

我寄快件给劳动监察部门，说厂里有问题，要他们整改一下。劳动监察来了一次，没去车间，只在办公室转了一圈。我知道是



因为我写了信，劳动监察才来的。过了几天，我去劳动监察（问结果），他们说没问题呀，都是合法的呀。当时我冒火了。我说你们那天去了就坐在空调房里都没出来过，问都没问一下工友。他们说我们下星期再去，不通知你们老板，亲自下车间去看。我回来后，跟几个玩得好的管理说，过几天劳动监察的人会来查厂的。那几个工友，主管，组长，什么态度都有，有的支持，有的旁观，还有的背后说风凉话。劳动监察的人又来了，还打电话让我去厂里的办公室。我在投诉信里要求他们给我保密，所以我就说不去，让他们到车间里看，他们真跑来了，但是后面跟着尾巴——行政经理，总之厂里知道是我投诉了。

不久，老板那个女秘书上班时找我，说我瞎搞，也不问一问其他员工有谁愿意买保险。我装糊涂，说不清楚。

老板开始报复我，调我去产线上，工资少了几百，还不给我加班。

我被调岗后，打 12345 电话，投诉说劳动监察泄露我的私人信息给老板。监察的人开车来厂里，说没泄露我的信息，至于厂里怎么知道的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打 12345 这个电话，小事有时还管用，大点的事就一点作用不起了。我们行动（罢工）的时候，天天打，电话里每次都说“信息还没反馈回来，要继续等待”。

在产线上做了两个月，我给当地社保局写了投诉信，反映养老保险的问题，但是信原封不动给我打回来了。收到退信的那天，正好区社保局召开医保问题研讨会，我作为“网民代表”去参加了，把投诉信当面交给社保局长，说厂里没买养老保险，要求给我们补缴，而且要厂里缴纳滞纳金。局长说这个事我接受了。

没过两天，镇上的社保站给我打电话，说好话，说对不起。二老板叫我去办公室，说因为沟通不良，有误会，让我回原工作岗位，待遇不变，让我不要往上面跑了。我回到了原岗位。这段时间的事情没跟我老婆说过，只说我没班加。那两个月因为调岗而少给的工

资后来也没有补给我。

食堂进行了整改。不在食堂吃饭的不再扣钱。不久开始停止使用童工。工资条也开始发了，但上面没有具体内容，没有时间，连“工资”两个字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数字。我直接找财务部的人说，什么都没有，看不懂。

我个人维权的时候也想过后果。老板逼我辞工，我就不辞，想看 he 怎么办。我想无论如何得有个结果。我坚持了两个月，主管旁敲侧击，让我辞工算了。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公积金的事，我给社保中心发了快件，中心回信说反映的事属实，会尽快落实。后来厂里出了一个公告，宣布开始买公积金，但以前的没补。我们没要求补缴，有些工友不愿买公积金。很多工友都不了解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事情。

当时有一次，行政经理在走廊叫住我，他是我老乡，叫我不耍搞了，安心打工。他说自己毕竟是厂里的经理，现在老乡闹事，别人都说老乡扯他后腿。我敷衍说可以，看老乡面子上，不耍搞了。我跟他没私人关系。

我们厂没有工会。本来我还想建个工会，但是 2013 年开始放风说搬厂，就没必要建工会了。工会不是一两天能建起来的。维权和投诉这些事情，我都没跟老婆说过，怕她担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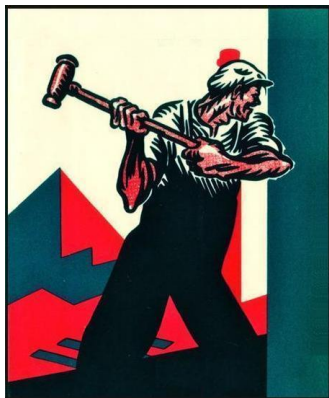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搬厂和罢工

从 2009 年开始，我们厂辞工就批。到最后厂里只剩下四百多人。

2013 年过年之前，高层传出消息，说要彻底搬到惠州去。我们半信半疑。过了春节，厂里的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宣布：半年之后工厂要搬完。这样，厂里员工之间基本只讨论一个问题：搬厂以后

怎么办？两个工友遇到，说得最多的就是“你过不过去？……我过不去。……那过不去怎么办？”各部门慢慢就形成一个个小圈子，圈子之间互相打听。

圈子里比较积极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和工龄比较长的普通员工。员工大多有五六年工龄，也有十几年的。这些圈子比较松散，只是互通信息，比如货仓部的人跟老板打交道比较多，透露说老板已经不进料了。生产管理部门也传出消息，说订单都拿到惠州去做了。各方消息就综合起来了。



罢工前半个月的一天，我们临时决定开小会。除了我，参加的十来个人全是管理，包括一个助理，其他是组长。开会是为了正式讨论这个事儿（搬厂），统一诉求和行动。这次小会之前，我没跟其他员工说过什么。会后，跟其他调机师傅笼统说了一下：开过一次会，商量了一些问题，有人挑头了，找老板要补偿金。问他们要不要参加。工友觉得有人挑头了，跟着走就行。

那个助理不愿出面，躲在后面。他说你们去搞吧，我是不反对的，搞好了大家都有好处。他没提过具体的意见，唯一的贡献是透露说老板在找家私厂的场地，准备要交押金了。他后来做了厂方的证人，没出庭，在派出所做的口供，说罢工是我组织的，但他说不清楚是否是我让工人堵马路的。

几乎没有管理人员愿意去惠州，包括那个是我老乡的行政经理。最后只去了两个，一个是后来指证我有罪的主管，还有一个是仓库主管。惠州的厂已经有一套班子了，这里的管理去了是多余的，没好日子过。没去惠州的管理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在其他地方做文员，有的去搞建筑了。

罢工前三天，我们几个人分头通知其他工友到厂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开第二次会。为了防止出现叛徒，我们都是挑可靠的通知。通知到的四五十个人基本都来了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：一是统一诉求，二是确定发动时机（搬机器之前或之后）。我们决定等他把机器放在平板车上时发动（罢工）。如果机器不装上车，就抓不到老板把柄，他可以说不是装机器，车停在这里是要装其他东西。机器上了车，老板就会受到两方面的压力：一是我们的压力，二是车老板的压力。车是租来的，押一天要多少钱？第一次谈判，老板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放掉车，把机器弄下来。

这次开会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惠州那边基本工资太低，只有 1080 元，都不愿意去。我们确定了一些人做联络员，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向员工传递消息，比如跟他们说要搬厂了，问他们愿不愿去，不愿去怎么办。联络员由积极的员工来做，不一定是管理。

这次开会的原因是当天厂里又搬走了一些机器，但是因为没准备，大家都没行动。开会时大家说，今天拉走的就算了，下次再拉机器的时候就行动。具体的日子也确定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从上边知道了下次拉机器的日期。

第二次开会后，车间里的员工就都知道了（要罢工的事情）。大家也都知道要拦车。

罢工第 1 天

早上一开工，就随时有人向我们通知外边的情况：来了平板车，吊车也来了，装了一台机器了，装了两台机器了，车子已经要动了，等等。紧接着货仓部的人出来就把车拦住了，因为他们部门离厂门口最近，最方便。车被拦住后，各部门都拉了电闸，这样工人就可以出去了，就不会有人说：“我不去，你们前面闹吧，我就坐在这里，这样老板不会骂我。”

拦车的时候，仓库的工友把叉车的底板（码货的木板）甩在那辆平板车前。车拦住后，因为天气热，工友在四周乘凉。开始的时候，司机还想把车开走，但是只要一点火，工友就把车围住。试了几次没成功，司机就把车门关上，走了。罢工后，员工基本都下来了，只有几个主管呆在车间。二老板那个秘书让主管下来劝说员工回去上班，主管还让我们不愿做就辞工。大家本来就一肚子火，听了更火了。

拦车的时候没人指挥。行动开始之后，我们立刻写“告工友书”，贴在厂里，选出 20 个联络员，每个部门一两个。然后写诉求信。经过讨论，向每个人收十元的经费。

保安向我们提供二老板的信息，去哪里了，何时回来，等等。保安说，我们在看厂，老板知道我们还在做事，就不会换掉我们，对你们也是一种保护。保安还让我们员工在保安室吹风扇、喝水。保安队长躲开了，不露面。

厂里报了警，我们也给劳动站打了电话。劳动站的人来了。我们把诉求书给了他，他就走了。我们提出要找法人代表（大老板）出面。

下午，我们选了八个代表，其中 5 个是组长，3 个是普工。选代表的时候，有几个铁皮房挡着，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。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。“这个是代表，同意不同意？举手同意。”代表都是

口才比较好的。我们这些代表来自不同部门，互相之间不可能都认识。有一个女员工被选为代表，因为她能说会道，比较有胆识。我以前也不认识她，只知道她是 QC 的员工。我跟那些当代表的管理也不都很熟悉。之



前的各个小圈子，都知道每个部门有哪几个人天天问这事，所以开会的时候就知道了找谁了。

我记得好像是那天下午，派出所所有个警察开着车，用喇叭喊“工人来一个”。工人不理他，他就进来了。工友们让我把诉求书给他一份，他看也不看，当场就揉了。当时我已经转身走开了。他指着我说：“你过来！”我不理他。工人们围了过来，一些女工骂起来。他就躲进办公楼，要从后面跳墙逃跑，但是爬不上去。后来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，自称是值班领导，要我进办公楼说话。我不进去，进去了就说不明白了。他就把我叫到一边，说刚才那个警察中午喝了点酒，还说他们都是我的老乡，要我向工友们解释一下。我们提出：要向工友道歉，并保证工友的安全。那个警察就出来了，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扯什么“我的中国梦”。因为天很晚了，工友们就让他走了。

开始的几天

罢工开始那几天，劳动站和派出所那些人每天都来转一圈，不超过 10 分钟，看我们乖不乖，看没事就走了。一次几个工友围上去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们这种还是比较理性的，是值得表扬的。”因为罢工的头几天工友们都没出过厂，就一直在厂里面静坐。工友们看见他们就会上去问嘛，还给他们水喝，都是工友自己买的。大家围上去问的时候，好像诉苦一样，说都等了几天了，老板跑了，都不理我们了。

我们收的经费，用来买水，给上访的代表车费，给守夜的工友买夜宵。罢工当天就有七八个工友去了区劳动局，是一两个联络员带着工友去的。

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。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，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，买面包饼干。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

来。八个代表当中，我和另一个讲话比较多。有的代表完全不说话。开会时不止八个代表参加，联络员也参与，经常是二三十个人开会。有时也会增补联络员，因为原来的联络员外出办事，需要一个人联系工友。

我们对外说代表是过了几天之后大老板来了才选的。实际上罢工第一天就选了。有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。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。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，怕老板把车子开走。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。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，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，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，在会上安排。坏就坏在后面，工友不团结，代表不团结。老板从中分化、瓦解。那个助理就被分化，说老板有黑社会背景，找黑社会搞你们几个。时间长了，工人也有些急躁、冲动，有时候开会找不到人，就难以做决定。

我们那边另有一个厂也搬迁。老板给了代表一人两万块钱，结果第二天谈判，工人代表都跑了，没有人去谈判。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。

当时我估计（罢工）7天内就能解决，因为有一批货要出。罢工后有一天，有个洋客户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把货放了，说要走柜了。那个人普通话讲得很好，听不出是洋人。大家去工会也好，去劳动局也好，留的都是我的电话。事先也没想过这事，不知道去那些地方投诉还要留电话。

罢工开始到第一次谈判，代表的情绪都很高昂。代表每天开会，安排事务，比如派几个人送材料去市工会。送完回来还要开会，说说工会的态度是怎样的。派出所和劳动站的人来厂里，我们还要有人接待，然后还要开会，把他们说的话给工友传达。

市工会没表态，只说“东西我们收到了”。区工会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工会是党领导的，不能离开党，要解决还是要去找基层党委，有结果再汇报给它（工会）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与工会再没其他的联系。

后来工友去走马路，去拦了路，然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就天天接触我们。我们以为通知了街道信访办，就是通知了党委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只要去找党委，他们总是说“去找信访办”。



有一天，我们看见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厂门口。虽然工人代表都认为老板不会找人来打我们，但是也考虑拿到补偿后怎么脱身。我们想的是（笑），准备一辆车，赔偿的时候代表们先拿钱，然后代表监督着给所有工人发钱，拿到钱的不能走，最后等大家一起走，然后代表们直接跳上车，先找个地方躲几天。

罢工后有一天，听小道消息说，二老板发话，宁肯拿出一千万跟工人斗，也不给工人半分钱。有人说这是二老板私下里当着某些人的面说的，不是在谈判桌上说的。消息是从管理那边传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搞了。我们粗略地估算过，所有人的赔偿，按照法律，共四五百万，不到一千万。

罢工前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附近一家厂罢工的事情。我们厂出事后，我就跑去那家厂了解情况。他们也是搬厂的问题，不妙得很，老板已经搬走机器，在另一个地方恢复生产了。厂房是租的，水电都停了，只有几十个工友在坚守。我跟他们交谈了一下。他们不接受当初老板提出给 30% 的建议，坚持要 100%，结果听了区政府的建议去劳动仲裁，一拖四五十天。他们等得非常烦了，还有点害怕：万一仲裁结果不利，不是连 30% 都拿不到了！

我把这个消息跟工人代表和联络员说了，申请劳动仲裁就是那个样子，我们千万不能申请。所以司法所一来建议仲裁，所有代表都反对。我说仲裁快的四五十天，慢的半年，而且风险大，所以我

们不要仲裁，要跟老板面对面地谈。

罢工第 3 天

大老板开车来了，带着保安队长，跟我们说不搬了，让我们回去上班，没有赔偿。当时几百人都听到了，大家高喊：“你说不搬就不搬啊！机器都上车了。”他自讨没趣，就走了。工友当时也没想拦住他。大老板平时下车间，经常跟工人打招呼，中秋发两个月饼，一个苹果，一瓶饮料。他平时对管理、员工比较和蔼。所以有些工人就信了他的话，说：“大老板都说了（不搬了），他说话算数的嘛……”有少数人第二天准备去上班了。代表们没出面，决定让几个女工去守着打卡机，劝阻他们不要去上班。一说他们就不去了，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。代表们没有想过强行阻止工人，都是用嘴巴说。

罢工第 6 天

有一辆从惠州过来的小车，要拉模具。我们把它拦下来了。车是老板从惠州请过来的私人的车。当时大家都说，连一根螺丝钉都不许他带出厂门。司机不知道我们厂里的情况，说是老板让他拉模具到惠州去。工友说我们厂都罢工了。司机就傻了，说怎么会这样子啊，还说他是做生意的，叫他来就来了。工友不放他的车，他就自己回去了，车留在厂里。其实开始时我们的筹码还是很多的，后来老板承诺给钱了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车子都放了。我们是带着诚意去谈的，哪知道被老板耍了一个花枪。

下午，厂长从外地的分厂过来，带着律师。那天轮到我休息，没在厂里。工友打电话给我，说厂长开车来了，要把车拦下。后来

工友去保安室查出车是免登记的，就拦了车不让出门。厂长很生气，说是他的私车。工人说这是厂里的车。结果厂长报了警，拉来一车防暴警察，但是没进厂。工友看到特警来了，都围到了厂门口，就是不放厂长的车，看他们要怎么样，是不是会去抢人。工友们也做准备了。

我骑电动车赶到厂门口。他们把我拦住了。派出所所长要我放厂长的车，否则抓去派出所。我说关我什么事，你要放就让工友放，你要抓就抓。我不理他，就跑去工友中间，问咋回事，工友说律师来了。我又去问律师是什么情况。律师说他们是来找工人代表谈的。我说可以啊，就约了第二天在厂会议室谈判。

律师走后，我们开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，决定八个人一起去，我和另一个代表主谈。我们还请了维权律师。

罢工第 7 天

上午从 10 点到 11 点在厂里谈判。对方是律师出面谈，劳动站的人也来了，我们请的律师也来了。老板的律师跟我们说不搬了。我们则提出了 5 点要求（经济补偿，高温补贴，养老保险，年假，法定节假日工资）。厂里的律师说他没权做主。就这样，上午的谈判没什么结果，但我们觉得谈判进行得还算正常，准备下次再谈。

中午的时候，厂里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下午 2 点继续谈。我们就把我们的律师叫了回来。

下午两点，回到会议室，我们发现屋子里装上了上午还没有的摄像机。这次二老板来了，他拿着一份声明念了一遍，说不搬厂了，要求工人回去上班，不上班的算旷工，超过三天就开除，而且还要工人赔偿罢工给厂里造成的损失。他说完后，劳动站的人来了，说经过检查厂里没有违法行为，现在也不搬厂了，让我们回去上班，否则就是无理取闹。然后他们就不跟我们谈了。

我就火了，喊道：“厂里不给买养老保险算不算违法？厂里不给……算不算违法？……”首先一条，他在搬厂，机器都已经搬上车了，被我们拦下来。他不承认搬厂说不过去。第二个问题，社保没买。还有年休假没有，法定节日的工资也没有，高温补助也没有。怎么能说厂里没有违法呀。还有工资条的问题，都不是按照深圳市工资支付条例制作的。工资条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，就是一张纸条，除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什么都没有，月份都没有。我说了他们一顿。我说：“你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！厂里这么多违法的地方，你还说没有违法。”

总之，厂里的态度是不谈了。我们的律师见状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，也没有跟我们代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这个心照不宣嘛，留下来有什么事情就说不清了。

律师走后，我们出去把跟老板谈判的结果对工友们说了。工友们一听情况是那屌样，当时就炸了窝。大家冲到了街上把北环路拦了。防暴警察来得非常快，明显是有备而来的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工友们赶回到厂里。有一个女工还把胳膊摔断了。

工友们被赶回厂里的时候，还不到下班的时间。办公楼里还有行政人员，二老板也在里面，大家就把办公楼围住了。后来政府的人也进去了。在办公楼外静坐的时候，有一个工友因为心脏病发作，病倒了。人命关天的事，厂里面都没有一点表示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。从人道主义来说，也应该有所表示啊。经过这些事，工友们把他们看透了，更加愤怒了。

围了办公楼，劳动部门就介入了，那个站长给工人做思想工作，让我们不要闹了。工友们就要求让二老板出来，跟我们见个面，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，收回他的那个通告。我们一直搞了一两个小时，二老板躲在办公室不出来。我们没有冲进办公楼，只在外面叫，让他出来说清楚。警察没进厂，但厂里有巡防，就是那些骑摩托车的，都是打工的。最后二老板终于露了脸，说了一大堆什么“做不了主”，

“代表不了法人代表”，就这样。

我们听到了传言，说厂方“要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工人代表”。为防万一，我在微博上把这件事披露出去了。

这以后，有 5 个代表退缩了。退出的代表有管理，也有普工。我们从联络员中补选了 5 个新代表。后来我们做工作，那 5 个代表又回来了，补选的那 5 个人还去做联络员。

罢工第 8 天

工友们一早就出发去街道办静坐，二老板也跟着队伍去了，是街道办叫他去的。工友们大概去了 300 多人，三三两两坐在街道办门外的草坪上，带着横幅，是临时用毛笔写的。这次去请愿静坐是自发的，不是代表决定的，工人代表都没有参加。因为前一天老板



拒绝谈判。没得谈判，我们代表就不起作用了嘛，所以我们就当工人代表了。街道办应该不知道工友要去请愿，知道的话应该会提

前拦下。当时我在出租屋，街道办打我电话，让我去现场。我去了现场一看，出动了好多警察，把工人从两边围住了。围起来又找不到工人代表——因为我们 8 个代表都没去——所以才打电话叫我们去现场。不久，政府说老板同意谈判了，让我们这些代表给工人做思想工作，劝他们回去。大老板通过政府给我们传的话。这次街道办没有抓人。政府的人还承诺会帮我们解决问题。

我们跟工人传达也很顺利，就说老板承认给钱了，同意第二天下午 3 点在劳动站的会议室就具体问题进行第二次谈判。

代表们以为会向好的方面发展，但是也开会讨论过，如果谈崩了，要把老板逼回谈判桌来。我觉得应该以同等的地位来谈。我都跟他们说：“谈判应该抱着诚意来。你们不能盛气凌人，就认为我们是雇员，就是下级，好像古代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的长工一样，就要听你的。那样就谈不了，是不是？”耍阴谋手段，让工友们把他那个都看透了。其实每天都有工友说我们代表胆小怕事，也经常有人喊着要去走马路。

罢工第 9 天

上午，我就被派出所的教导员叫去谈话。他给我施加压力，让我不要再发微博，说了一通大道理，把毛泽东都搬出来了。“我是听毛泽东的话的呀，他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呀”，说那些鬼东东。总之他就是要我别发微博，政府部门有压力；再一个就是，让我对下午的谈判不要有过高的期望，让我也跟工友说一下。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半开玩笑，并不是那种蛮严肃的。

我就打哈哈，说可以啊，只要政府部门出面组织谈判，我发不发微博都可以；只要促成了这次谈判，我们发微博还有什么用？我还说：“我的微博又不犯法，要是谈判没有成果，微博肯定还要发呀，我的微博又不是煽动工友们做什么事，只是记述每一天工友所做的

事情，以及事情发生的经过。我又不是捏造事实。”反正我就讲发微博又不犯法，该发的我还是要发。他也没说你再发我就抓你，就是打哈哈，说不要紧的，政府会出面的，要相信政府，相信党。

他们也知道机构，说那些都是境外势力，没安好心，让我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。我就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找这些机构出出主意啊。当时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，他也开口了，说希望了解一下机构那些人，有机会让我带他去。他还说跟我是老乡。开始我还觉得这个人挺好的，因为他说了些同情我们的话。

我从派出所出来没多久，就接到房东的电话，说不让我租房了，限定我5天内搬走。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。我说：“你们怎么回事呀，你们这样搞太不人道了吧！”派出所的就说：“这个问题我给你调查一下。”然后我去找房东，刚好见到房东的时候，那个警察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，我直接把电话给了房东。后来房东又不赶我走了，我就一直住着。

我想他们早跟老板沟通好了，已经准备好了筹码。当时派出所只叫我一个人去，我觉得不可能抓我，但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其他代表，其中有两三个人还跑到派出所门口去等我。后来，他们还找我的亲戚和老乡来劝我。我们厂2006年搬厂的时候，我的一些亲戚和老乡跟大老板去了惠州厂。现在，老板让他们给我打电话，叫我不要搞了，不要跟老板对着干，安安心心地打份工就行了，还叫我去惠州去。没说给我什么好处。我那些老乡也不敢承诺那些。他们应该没受到什么压力。我就说：“要的，要的，我马上就搬过去，你给我把房子租好。”因为是亲戚，打哈哈嘛。

下午，第二次谈判在劳动站开始了。虽然上午那个警察叫我们有心理准备，但是谁知道老板给的牌吓人——300块——当时把我们就搞懵了。他们叫我们期望值不要过高，谁知道给那么少。

谈判一开始，大老板就来了，装得好可怜的样子，说自己感冒了，还让我们看他手上的针眼。他说对工人从来不刻薄，这么多年

了，拼命在外面跑单，尽量给工人多一些加班时间，让工人多赚些钱。总之是些收买人心的话。他穿的衣服，普普通通的。老二也一样，穿得干净些，整洁一些，那衣服也不贵。老二那个秘书穿得很好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秘书给自己搞钱，每周六把厂里那些边角料拿车拉出去卖钱，搞了一两年。那个废料好贵，一车大概要上万。

大老板露了个面就走了。他只是答应给钱（没说给多少），具体让我们跟律师和行政部经理谈。所以我们都把老板想得非常好，觉得应该会谈成功的。有一两百工友在劳动站外面等。

我们开始跟律师谈。律师说给 300 块。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我们还是一下就懵了。打发叫花子啊！我们不干。

谈判之前，我预期的数额是 2000 块。当时我们以为对方会以最低工资为底线，所以我们就加个码，提出 2000 块，考虑到有加班、法定节假日工资，都算在一起，这样也不为过嘛。双方讨价还价，不就成交了。哪知道给个 300 块。谈判前，我跟大家说，不要把工人分成几份，否则有的工资低，有的工资高，工资低的就不闹了。跟管理人员也做思想工作，就说是一口价，罢工了，不管是管理还是普工，商量一个统一的诉求，2000 块一个月。参加进来的管理大都是基层管理，他们都非常赞同。

我是首席谈判代表，其他代表七嘴八舌也发言了，都说 300 不行。律师提出 300 块，我们也抛出 2000 块。律师说 2000 块比较高，要打电话给大老板，于是现场就打了电话。然后律师说，大老板同意加到 400 块。我们说不接受，要继续谈。最后律师说经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再加 100，加到 500。



我们说不行，还是差得太多了。

谈到 500 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我们就说今天不谈了，选个日子再谈。跟律师约定两天后谈。最后，律师转达大老板的意思，说既然再谈，把车留下就没有意义了；老板有诚意，工人也要拿出诚意。我们就中招了。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，现在愿意谈了。我们就说行行行，要拿出诚意来。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同意了。车子可以放，但是机器设备不准搬走，卸下车，放到车间里面去。

我们代表在现场交头接耳地谈了几句，就决定了。有反对的，但当时是少数。而且还考虑到，车子放在厂里，每天还要派人去守，比较麻烦；夜里蚊虫多，大家也烦了。刚开始几天还有人积极报名去守车，后边几天就没有几个了。我们就按部门轮流守。把车子放了，工友就轻松一点。所以我们决定把车放了算了。

我们以为再谈一次应该就有结果了，至少会有 1600 吧。我们也向工友承诺了，保底 1600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，因为 300，400，500，还在加价嘛。

谈判是劳动站的站长主持的。对方有四五个人，派出所的人都在楼下。劳动站的人在做会议记录。我们没有做，没想到要记录。

晚上 7 点行政部经理又给我们打电话确认，因为他怕有工人在放车的时候再闹。放车比较顺利。当时现场有一两百个工友。

放车的事情不可能每个工友都通知到，有的工友出去跑电动车，有的搞了手工活在家里做。这就是工友不团结的表现嘛。没在厂里的肯定就不知道了。在场的大部分同意了，我们就放了。

我们搞了那么久，政府部门好像是站在我们一边的，还当着我们的面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板我们要把他赶跑的，他不跑我们也不让他在这里做了。”劳动站的站长就说过这些话。律师和劳动站都没有说过我们拦车是违法的。那个时候劳动站的人来厂里，看到我们拦车，还说从现在起一根螺丝钉都不让老板搬走了。我们一听就感到舒服，觉得是在为我们说话嘛。我们以为政府部门也给了老板不少

的压力，比较乐观地估计了形势。

罢工第 10 天

老板把办公室和车间的门都锁上了。我们开了一个会，商量第二天怎么谈，怎么坚持到 1600 块。

罢工第 11 天

第三次谈判又是下午 3 点，但是这次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老板没露面，只有律师、行政部经理和一个文员，谈判地点还是在劳动站。一见面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。律师说老板已经决定了，最多只能给 500 块钱。这样等于根本就没得谈嘛，就是告诉我们只有 500 块，干不干都是 500 块。辛辛苦苦十几天，等到这样一个结果。我们马上出去给工友说。工友火了，就在劳动站闹了起来。

律师说作不了主，我们就要求他把老板叫来。他跟老板通电话的时候也发火了。老板在电话里说不管了，律师说：“你不管了，我被工人围在这里了。”老板说：“围住了就围嘛，你就坐在那里嘛。”律师说再也不接这种案子了。当时在劳动站，那个站长什么都没说。有的工友开始抱怨，说本来不同意放车，结果现在老板翻脸了。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好像两头不是人一样的。

后来一部分工友就跑到街道办去抗议，把街道办前面的路给堵了，当时正是下班的时间。这次街道办采取行动，把堵路的一两百个工友全都抓到派出所去了。还发生了冲突，有两三个女工被打伤，在医院挂盐水，住了一个晚上。

我们这些工人代表没有跟着去街道办，是联络员跟着去的。有些问题工人代表该避嫌还是要避嫌。我们工人代表都不参与工友的那些过激的行动。

工友们被抓去派出所之后，那个所长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给工友做思想工作。我到了派出所，看到工友们被围在派出所的操场上，有联防队员，有特警，总数不止一两百，估计几个社区的联防队员都去了。那些人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但都空着手。派出所大厅里面还坐了不少穿制服的民警。

派出所给那些联防队员买了盒饭，但是工友们都喊着还没吃饭，肚子饿，就把他们的饭抢来吃了。

搞到晚上 11 点，所长想让工友们都赶紧回家。工友说不行，抓的时候用车子，走的时候也要用车子送走。所长让我赶紧做思想工作，让工友们回去，因为天又在下雨嘛。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喇叭，我就对工友说，下雨了，我们早点回去算了。

罢工第 12、13 天

周六和周日，平平淡淡，没有什么事情。我们几个代表和一些联络员，几十个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去写字楼里喝水吹空调，把老板逼回来。之前我们都没有进过写字楼，有意识地避开，怕老板说我们干什么什么的。



罢工第 14 天

100 多个工友进了写字楼。写字楼里有一些文员在上班。工友

没打扰他们，自己在写字楼里找水喝，乘凉，有的就坐到会议室，把空调也打开了。工友们年龄都比较大，不是那种毛头小伙子，不会有打砸抢。大家就是进去吹空调，不动他的东西。

那天街道办专管政法的书记来了。他来了以后联系厂长，把厂长也给叫来了，那时已经晚上 8 点多钟了。厂长还带着一个律师和一个外国人。那个老外是厂里的客户。厂里有一批货做好了，一直放在仓库里。他们说船期到了，要走货柜，很急，让我把货放了。车放了工友们现在还一肚子火气，打死也不放货了。

我们刚要谈，政府的人撤了，然后厂长又不想谈了，想跟着一起来。工友们不让他走，把他堵到办公楼里了，一直搞到晚上 2 点钟。他写了份书面承诺，答应第二天早上 9 点来谈。劳动站的主任也写了保证书，还签了字。我们就信了他们，准备第二天再谈。

罢工第 15 天

上午，劳动站的人找我去，说是要做口供。从我们罢工第一天到现在这么久了，到现在才收集材料，我觉得劳动站就是要逃避责任，留一个后手。好像说不是他们不作为，一直在查，口供也都有。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些了，他们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。这次去算是正式立案。罢工第一天我们就找他们投诉，他们都没有立案，一直拖。现在他们一看老板这样，没办法，就找我们做个口供。我去劳动站，有几个代表知道，其他人还不知道。

这次去，我们又多了一个诉求，要求解决我们吃饭和喝水的问题。厂里什么都有，有厨师，有厨工。我们一闹起来，食堂就停伙了。我们要求政府出面，把食堂开起来，让工友有饭吃，这样工友心里平静下来，就不会做出什么上街呀，上访呀这些事。街道办的那个政法委书记承诺派个工作组到厂里，讨论工友吃饭的问题，还有如果老板跑了我们这个厂怎么办的问题。

我从劳动站回到厂里，发现工友们已经上街了，这次也有二三百人，还打了横幅。我都感到奇怪，怎么搞出横幅来了。原来是他们自己订做了那种打印的横幅。这次没有抓人。工友们游到街道办，警察是陪着走的，还有摩托车给开路，有警察控制路口。

那一天晚上出了怪事。天上下了好大的雨，但铁皮房着火，全部烧完了。里面有一部分废料，一些机器设备。起火时厂里有保安。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。有工友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不要来了，说全部被火烧完了。我跑到厂里看，厂外停了十几台消防车。

工友们对起火议论纷纷。有的说是老板自己找人放的火。

派出所把所有当班的保安都带走了。我们也联系不上这些保安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工友们都很紧张，到处打听，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罢工第 16 天

政府派了工作组进驻到厂里，跟我们讨论吃饭的问题。因为办公室都锁了门，我们就在宿舍的空房间里谈。工作组人员有劳动站的，街道办的，信访办的，综治办的，开了十几辆小车子来。

整整一天，谈了两三次，吃饭喝水的问题都没谈好。当时有个书记说不能同意工人要政府管饭的要求，他说工人不是给街道办打工的，怎么能管吃饭呢。工作组说我们可以借钱，找村委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就是厂房的出租方。但是我们不同意，因为借钱明显是分化工友，就形不成战斗力了。我们说不要你们的钱，只是把饭堂开起来，有饭吃有水喝就行了。但是他们始终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。谈得没有结果，工友们就在外边叫。

到了晚上 7 点钟，他们（工作组）开着车子又跑了，留下我们工友在那里发怨气。工友们开始吵闹，说要去市里。

那个时候大家都被搞疲了，而且有些工友因为起火的事情有恐

惧感，不知道会不会算到我们工人头上。

保安一直坚持上班，因为如果保安也罢工，老板就会从另外的地方请保安来，这样对工友不利。所以保安就坚守岗位。

当时的形势，我对起火不好判断，不知道是不是工友气愤不过放了火，或者是老板找人放的火。在不能对事情做整体判断的时候，我也有点恐慌，六神无主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所以那天晚上我早就回去了，晚上也没有开会。当时保安也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派出所对着火的事情下什么结论。

那天有个记者来拍起火的原因。政府宣传办的干事拦住记者，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。

晚些时候，保安们就被放回来了。派出所查了半天，监控也看了，定性为自然起火，与工友没关系。

罢工第 17 天

因为怕出问题，这天我来得早，六七点就到厂里转了一圈。保安被放出来的事情，大家都听说了。工友听说失火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，就放下了包袱。所以早上一到厂里就闹起来了。大概八点多的时候，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厂门口，有人喊着要去市政府，这时代表们还没来。

大概 9 点左右的时候，劳动站的人开车来了，但是没进厂，把车停在离厂 100 多米的的地方。我就去找他们谈。

大部分工友在外面住。9 点半左右，大部分工友都到齐了。大家就在厂门口吼。我一看，不知道谁又把前一天那个横幅拿出来了。大家又要上街。

之前，工人的行动都在代表的掌控之中，但是这次行动代表没有掌握到，那天一些工人代表都没来。

看大家从厂里冲出来，我想让劳动局的人劝阻工人不要上街，

但是他们不理不睬。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做思想工作已经做不通了，政府部门这时应该出来做思想工作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工人代表身上。他们不理，好像看戏一样。事后，那个劳动站的主任一直不承认我有让他们出面劝阻工人。

工友们劝不住，我也不放心，就从后面赶了上去，跟大家一起走。我们走的时候，派出所的和街道办的都跟着我们走。

开始我们走的路比较繁华，路上有很多人看，还给我们拍照。后来走了两个多小时，走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了，公路中间都是隔开的，对面的车子都看不到这边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才抓人。我觉得他们真会选地方下手。

抓我们的不是联防队员。我们那里的联防队员曾经跟我说：“我们是不会抓你们的，听说要抓你们，我们都跑了。我们也是打工的，也希望工人闹，这样才能加工资。”他们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七百多块，加上七七八八的，才两千二三百多块钱，他们也不满意。

上次街道办抓人，派的是机训队的人。这次去市政府上访被抓后，也是机训队押送。一个年轻的机训队员还跟我说，之前看见过我在派出所劝工友，表现很好，不知道我怎么今天又一起上街了。我就跟他聊，问他属于公安还是什么，他说不是，是招聘的，每天搞训练，也是维稳。

街道办抓人那次是晚上，离大路比较远，抓的时候也没有过激行为，就是两个人，或三个人抓一个，抬上车。这次不一样，那些人冲上来，一抓头发，往地上一按。

当时他们冲着我过来，好多工友就把我围住，不让他们抓我。但是他们一个个牛高马大，工友们顶不住。



我看到工友们被打，嘴巴流血，头发都撕掉了，大家都坐在地上哭爹喊娘，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。我就冲到前面去和他们理论。我说我们是要工资的，不是社会上那些歹徒，我们是想要我们的血汗钱。我说你们也是父母生的，你们也有姐妹父母在外边打工。

大家被打，不是感到恐慌，而是愤怒。

当时我就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，喊共产党万岁。

他们开始还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一喊，他们就知道了。有个警察就来指认我。他们冲过来，我就放弃抵抗，跟他们走了。那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最后开了几辆旅游大巴过来，把工友们带走，分别关在不同的派出所，每个所关了二三十个人。

他们给我戴上手铐，到派出所后，把我关在小房间里。关了一两个小时后，有一个警察来审问我。他说是我老乡。我说老乡你不要害我。他说没事的，会让我看的（口供）。后来我看了口供，签了字。过了一会，他说不行，要重新做口供。第二份我没仔细看就签字了，因为太累了。后来庭审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，口供里出现了工友打警察，而且出现在口供的底端，还有工友不听劝告一类的话。

最后，警察说今天晚上肯定不放你，要放也是明天早上放。第二天很多人都放走了，剩下六七个。我就叫喊，抗议。我关的地方没空调的，好热。他就把我和其他几个工友关在一起。到晚上，那些机训的人又来了，我们就被分开，穿的马甲都不一样，有刑事拘留，有行政拘留的。我们是红马甲。

后来庭审时，我说做了几次口供，第二次口供我都没仔细看。只有一个人给我做口供，没有告知我的权利和义务。根据条例，应该两个人问。他们的做法不符合程序。我的律师就这样为我辩护。我也跟法官说，被抓后带着手铐，被关在小屋子里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了，而且还连续提审我。

看守所中

所里最后剩下的几个人是被列为重点的，有走在队伍前面的，有打横幅的，有反抗了的。除了我，还有两个人关的时间很长，都是关了 37 天。其中一个工人代表，另一个女工友好好像打警察了，他们说有录像。

派出所说最多关三天，但是后来知道，有延长羁押通知书就可以延长。我们没有想到会判刑。

我出来的时候，才知道有工友交钱了。我老婆当时都准备了 3000 块，但是传出话来，说 3000 块不行，我老婆就准备了 5000 块。有个警察跟我老婆说，不行，放不出来了，还把钱退回来了。我进去后一直到开庭才见到我老婆。

有个维权律师帮我介绍了一个女律师，来所里看了我一眼，收了我 3000 块。

后来我被调到区看守所，开始在一个仓里呆了 10 天，然后到另外一个仓，就一直呆在那里了。进去的时候新老分开，有个过渡仓。

过了六个月才正式提审我。我不承认游行，我说不是游行，我们是去上访，是自发的。还是一个人审，就是问最后一天的事情，问是不是我组织的，横幅是谁做的，钱是不是我收的，工人代表是谁，就问这些。我说你们都头戴钢盔，手持警棍，只有你们打我们的份，哪有我们打你们的。

里面吃饭，冬瓜不刮皮，南瓜不刮皮。要吃好一点得自己买。烟不能买。管教会给牢头烟，其他人就捡烟屁股。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贩毒的。

一个仓 12 米长，3 米 6 宽，最多装 51 个人。大通铺宽两米，过道宽 1 米 6，有身份的睡铺上，其他人搞点纸睡地上。睡在下边的人像狗子一样蜷着睡，腿是伸不直的。

信可以写，收信好一点，往外写很难。每一封信都要拆开看的。

开始还能收到信，后来管教知道了我的事情，我就收不到信了。

开始我睡下边。后来成老人了，跟他们玩得比较好。我跟他们说我的情况，他们觉得我不是坏人，是冤枉的。逮捕后，他们说我最多关五六个月，拘役6个月以下，不会有案底。

后来我也很急躁，急了的时候就用手打床板。平时上午跑步，下午看书，有时也讨论问题，家庭，社会，政治啊，打发时间嘛。晚上看电视，7点看新闻联播。仓里有电视，挂在墙上的，台式的，不是平板的。里面可以买书看，他们送个书单过来，可以自己选，选了给你买了送进来，扣你卡里的钱。

我买了好几本书，有郎咸平的，于征荣的，经济学的也有。外面的人是不能送书进来的。里面看书的人也有一些，但是只能在他们那个书单里选，不能随便挑。

关于工人领袖和工人代表的一些想法

为了进行劳资谈判，要培养的不是工人领袖，而是工人代表。工人代表需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。工人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能产生的。需要漫长的时间，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，形成一定的关系以后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。否则罢工那一两天上去（做代表）的工友，

很容易被资方收买。

目前来说，在广东这地方，在每一个工业区，每一个厂，都进行劳动法的学习，培养工人的意识，是比较行之有效的。普及了以后，其中一些积极分子，把他们聚拢起来，让他们慢慢明确谈判的理念。这样万一厂里



有什么事，涉及到具体行动的时候，他肯定就会站出来，挑起那个重担。

工人代表，首先一条，他还是一个工人。工人代表只能起到一个沟通或桥梁的作用。但是工人领袖就不一样。领袖有绝对的权威，敢担当，挑大梁的那种姿态。资方和政府，他们不怕工人代表，他们怕工人领袖。

领袖鼓动，在厂与厂之间进行串联，有那种可能。他就会脱离工友。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说，工人领袖是百分百被打压的。但是工人代表的定位与工人领袖不一样。代表本身还是个工人，只起到与资方和政府部门沟通的作用。

工人领袖和工人有脱节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有绝对的权威，他就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跟工友们协商的那个阶段。他可能会自己片面地，或者武断地做出判断。工人领袖容易认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“你们”好，所以跟工友产生隔阂。现在来说，还是不能培养工人领袖，要培养工人代表。我觉得现在也还没有那种工人领袖。

还有工人团结和工人代表团结的问题。有一件事，有个主管给一个工友打电话，要他去车间，其他工友就以为他被收买了，很多人都针对他一个。他去了车间没找到主管。我听了这个情况，马上就向工友解释清楚了，告诉大家下次不要这样了，下次有什么事情不要单独行动。

基层管理做代表和普工做代表有一点点差别。基层管理平时要能管住工人，必须在工友中有一定的威信，到行动的时候，也用那种行政的方式。但是普工就不一样，靠自己的本事上去，他做工友的工作就困难些，因为工人会想，“你不是我们部门的，或者你不是当官的，我为什么听你的”，差别在这一点。

基层管理说的话就会起一定的作用。但是平时对工人很凶，关系不好的，就不会成为代表。

罢工中，有些普工有很大变化，胆量和口才都有变化。有个女

工，现在进了一个厂，马上带起 3 个工友去告老板。我就说，这种子，不能灭了，要保持联络。

个人经历

我 1993 年中专毕业，学的土木工程。学校就在老家的市里。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镇集体企业。我们是学校最后一批包分配的。我在工地的施工现场，是施工技术员，就是把图纸变成实物，现在都叫项目经理了。刚毕业时工资好低，才两三百。当时经济比较拮据，想着找到马上能挣钱的活，没有想自己创业。

我做了几年，到 1997 年，经济疲软，通货膨胀，对房地产冲击很大。我又结了婚，有了小孩。

我们公司的经理和书记有矛盾。那时还是计划经济，物资要指标，工地上用 20 吨钢材，批了 25 吨，就可以卖掉 5 吨的指标。当时我刚进公司，有些流程不太熟悉，上了别人的圈套。他们让我去物资局签字领材料，我就跑去签了字。但是指标被那个材料员卖掉，他拿了钱跑到别的地方去做。后来上面派工作组进驻调查，发现是我签的字，要我说明情况。我就去找书记。书记又跟经理斗，就说不清了。其实那 5 吨钢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一气之下就走了。

出来后我投奔几个朋友。陕西也去过，柳州也去过，修高速，修厂房，工资要等工程搞完了才结帐。搞了几年，没意思。

2002 年到深圳，找职业介绍所，花了 100 块进了一家生产弹簧和螺丝的五金厂。厂里给办暂住证。押两个月工资，年终聚餐，没有什么奖金。那时工资才四五百，工人的工资都差不多。开始进厂做学徒，学那个仪表车床。这个厂没有休息日，就是星期天不加班，其余每天都加。那个时候也听说有最低工资标准。厂里有宿舍，但

是我租房住。厂里管饭，伙食还不错。星期天还打饭回家和我老婆一起吃。

那时厂里小工伤还是有，但不知道有工伤赔偿。受伤后，厂里会安排一些轻松的事情做。受了伤，老板给治好了，就是好老板。不知道老板一年赚多少钱，但是肯定赚钱，因为第二年老板就买了一块地皮，修了一栋 5 层的厂房和一栋 7 层的宿舍楼，买了些先进的机器。老板是当兵出身的，当时 30 多岁，从部队退伍。

工人都是厂里培养的，工资不会太高。五金厂比较脏，工人流动性很大，有的人来了，看条件不好，就走了。

员工上面是主管，主管上面是经理。老板管单价，主管组织生产，工资也才几百块，比我们多不了多少。我那个主管才 20 多岁，比我还小。

我的工资开始是计时，后来计件。离开这个厂是觉得单价不公平，他想多少就多少，你做的多了，他就降单价，没有科学测算。五金厂辞工不好辞。但是我的技术还是比较好的，跟主管玩得也好，经理说要留我，重点培养我，但是我说要去步步高，他就给我批了。其他人很难批的，那时招人很难的。

离开这家五金厂，我堂弟介绍我去步步高。那个厂名声好大，哪知道工作强度大，工资又低。我的工作推着小车给产线上送料，把半成品送到产线上。它有 11 条产线，几千个人。工资 350 块一个月，1 比 1.1 的加班，累死了，每天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

我老家主要还是种植农产品，茶叶，蜜桔，橙子。这些年，我的老乡不少都回去了，在老家打工。我们那边就我一个还在外边打工，其余都回家了。有的自己在家开车，有的开个废品收购站，总之自己找门路，卖衣服，做个小买卖什么的，但还是在厂里的人比较多。我们那里有水泥厂，石灰厂，各种矿，还有做预制板的厂。那里的厂一个月 2000 块钱，管理没那么严，农忙时回家种田。

我有个表弟在老家做代理，卖金立手机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

有个老乡在广州开制衣厂，后来回家开，不久就垮了。

我现在早就忘记怎么种地了。我们现在完全与城市挂钩了，如果回到农村就是等死。



“很多代表害怕了，不敢再去。我不怕……”

—— 货仓部员工访谈

2001年我进了一家本地老板开的五金厂。工人有200多人吧，底薪是每月350元，包吃住。我开冲床，认识了老吴。他因为有学历，当了厂里的QC。那时候，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，还会看图纸。他从来不赌钱，不打牌的，爱看书。我在那个厂做了8个月就离开了，后来进了D厂。真巧，又跟他一个厂。

我是2004年6月进的D厂，当时厂里有3000多人呢。进厂后我一直在饭堂做厨师。2013年罢工前，厨师的工资是2200元，不加班。2013年3月，老板把饭堂解散了。我们这些饭堂员工，有的走了，有的安排到车间。我到货仓部开机器，很简单，半天就学会了。我本来是不愿意去车间的，不过车间有班加，工资比在饭堂高一些，2900元左右；组长的工资比工人多400块。

D厂罚款多，随地吐痰罚100元，吸烟罚200元。过去老板经常去厕所抓抽烟的。员工的全勤奖一个月60块，请假一天扣100块。车间里有产量要求，要完成产量才能下班。年轻点的员工玩手机，被管理发现会挨骂。有些新来的年轻人，长头发，戴耳环，还纹身。还有人是进了厂以后纹身的。

大老板和保安以前很凶。打饭要排队。排队站不好，保安就打人。现在变化很大，保安也不打人了。我刚进D厂的时候，附近很荒凉，现在很繁华，当地村民盖的楼越来越高。

2006年，D厂就开始搬了，前前后后减少了一千多员工。原来厂区挺大的，后来不断缩小，有的厂房都退掉了。保安室也不断内

移。

2013年开工直到我们罢工前，厂里已经搬走了8台大注塑机。那天，我从货仓部走出去打水，一看，厂里在搬机器。其他人罢工了，堵住搬机器的平板车，不让他们走。我在的这个货仓部跟其它厂房不是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事先不知道罢工的事。直到罢工第4天，我才跟他们一起堵车，因为那几天，有工人跑去骂我们几个还在上班的人，我们就不上班了。负责修理机器的工程部的老大也叫我们关掉空压机，因为全厂都不做事了，就我们几个人还开着空压机，费电。

第一次谈判我没去。听说谈判的时候，政府的人在那里录像，所以很多代表害怕了，不敢再去。我不怕，而且我在厂里很长时间了，大家都认识我，所以第二次谈判我就去了。谈判地点在劳动站。员工有八个代表，厂方和政府代表是五个人，包括厂里的律师和一个经理，劳动站的两个人，加上大老板。

大老板一开始就说：“我在外国跑单，很辛苦；员工都是我的财富；现在不好做，没有钱；我还感冒了，在打吊针。”大老板说根本就没有要搬厂，但是如果有的员工不愿意做了，他愿意给400块一年的补偿。他问：“你们愿不愿意，你们这些代表到底能不能做主？”我说：“太少了吧。我们只是传达一下（工人的意见），我们代表不了其他工人，只能把你讲的话传下去，看他们同不同意。”

劳动站的一个人，歪着脖子，还一抽一抽的。他当时听到大老板说给400元，就说：“老板你给的太少了。”劳动站的人一点都不凶。大老板就说：“我要去打吊针了，有什么跟律师说吧。”临走的时候，还回头跟我们说：“你们要自己保护好自己。”这次总共就谈了一个小时，大老板还提前走了。

我们是上午去劳动站谈的，很多员工都在劳动站外边等消息。大家的意思是至少要按底薪水平来赔，听说老板只赔400块钱，就说“不干不干”，有人当时就要去找市政府。

这次谈完回去，我也对工人说，把老板搬机器的车放了吧，厂里一天要交 9000 块钱租金呢。政府也说他们来厂里调查过几次了，知道老板要搬东西，让我们先放厂里的车走，政府担保解决赔偿的事。我们代表当时想，大老板说赔偿标准是每年 400 元，如果我们放了车，他会不会心软一些，（我们）减轻他的负担了嘛，这就好讨价还价。还有，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，把政府惹火了，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。所以我们就对工人说“让一步嘛”。

大老板说赔偿 400 块，八个代表都不同意。放车的事情，所有代表都同意放，但是很多工人不同意。有人抱怨：“跟老板谈都没谈好，就放车。”

放车的事，我们每个代表都跟工人说过。不过老吴说的比较多，他就站在厂区里，给大家讲。

谈判后的第二天，劳动站给我们发调查表，让每个人在上面写要求多少赔偿。有的写两千，有的写一千六，有的写一千八。

最后那一天，我们走马路去上访，都被抓了。放出来以后，大家回厂里，看到厂方的通知：参加过谈判的工人代表全部解雇。我们罢工期间的工资都没发。

我对老吴的印象很深。他讲法律是一条一条地讲。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。老吴反应快，不冲动，能主持公道，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他“多管闲事”。

我老家是江西的。政府搞退耕还林，据说是为了养大熊猫。我们家一共十亩地，一亩地给了两百块。后来政府专门辟了一块地，推平了，给村民盖新房子。



“老板实在太赖了”

——付组长访谈

我今年 46 岁，在 D 厂做了十年，其中八年当组长。我是谈判代表，多次参加与厂里的谈判。罢工后的第一次谈判我参加了。那次男的多，大都是组长。我们谈得很硬气，让厂里的人都没话说。但是谈判的时候，厂里拿着摄像机照来照去的，把代表们都照怕了。第二次谈判，就没几个代表敢去了，怕被报复。

第二次谈，员工换了一批代表，这回女的多。照我看，第二拨谈判的人不行，说不过厂里的，容易被厂里忽悠，也是这批人同意放走扣在厂里的那部（搬机器的）车。老吴一直参与谈判，没有退出来过。

当时来了几个所谓的“维权律师”帮工人，不过我对他们印象不好。他们一开始就说工人的赔偿要求没有依据，因为厂里确实还没搬完机器，没法要赔偿。律师的话让我们很不满意，后来没再找他们。厂里的法律顾问是个女的，太张扬了，谈判的时候老是抢劳动站站长的话，被那个站长骂了。

我对劳动站站长的印象不错，感觉他还是挺帮工人的。谈判之前，那个站长还给我们出主意，教我们怎么跟厂里谈。之前听说这个站长惩罚过一些违法老板。据说当初有个老板欠工资，站长打电话让他过去协商，老板不敢去，站长说“没事，你来吧”，老板去了就被工人打了一顿，结果老板很快凑够了钱，把该给工人的钱都给了。

厂里还请了一个律师来谈判，因为跟工人一直谈不妥，被我们

留到半夜两点半，他也不敢走，那么多工人在外面呢。后来他说可不干了，老板的钱也不要了，以后再也不接这种劳资案例，受不了。

老吴这人太实在，死板。我原来在厂里就知道这个人，但是没来往。我也知道他在D厂附近发过关于维权法律常识的传单。这次罢工，我们经常劝老吴不要在工人行动的时候露面。他有时候听，有时不听。这次被抓就是没听。当时工人走马路上访，第一批警察阻拦工人的时候，有几个在场的代表见势头不对，就走了，还给老吴打电话说“快撤”。他觉得没事，还是和工人继续走。后来又来了几百特警，把大家全抓了。

抓老吴的时候，好几个女工抱着老吴不让抓，但是没拦住。最后大家都被带走了，老吴被单独带上一辆小车。那些被审讯的工人都没说什么对老吴不利的话，只有一个工人听警察说他犯法了，被吓着了吧，说是老吴让他们上访的。

最后被抓前两天，本来我们跟厂里说好继续谈的，我都听到厂方有个人说（最多赔）1600了。就是那些大姐，喊叫几声，大家就跟去走马路了。她们简直是一群冲动的农村妇女……

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这么糟？主要有两点原因：一是把搬机器的车放走了，没有了谈判的筹码。而且不仅不该放搬机器的车，二老板和他秘书的私人小车也不该放走。我们上了厂里好几次当了。二是老板实在太赖了，在当地又有背景。

D厂罢工之前，附近还有两个厂因为搬厂的事情闹过，堵厂门堵了两天就解决问题了。一个是按照1600元赔的，一个按照12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。那些老板早都准备好钱了，能少给工人多少，算多少。现在还有一个厂的人在闹，守厂好几天了。

从D厂出来以后，我没怎么上班。前段时间进了一个厂，一个月干26天，两千八九的工资，加班费另算。做得没意思，又出来了。现在正规大厂不好进。我去应聘一个厂，厂里说超过45岁就不能买工伤保险，所以不要我。现在新开了好多小厂。以前大厂搬空的厂

房，就租给这些小厂，有的一层楼能分租给好几个小厂。我不愿意进小厂，加班费不按法律，一个小时才9块，做起来没意思。所以，我现在生活主要靠老婆。

我平时喜欢买码（买彩票），玩老虎机。家里一个女儿正在读大一，刚开学，学费还没凑够。



“我们也控制不了员工的情绪”

——烫金部龚组长访谈

罢工之前

我今年 34 岁，广西人，初中毕业。2004 年到深圳打工，10 月份进了 D 厂，做普通员工，后来厂里看我头脑灵活，让我做了组长。组长那时候工资也不高，1000 多块钱一个月。2006 年 2 月我就出厂了，回家过年。

2007 年 3 月，我第二次进了这家厂。

罢工前，我是二楼烫金部的一个组长。

我们做老大的肯定知道厂里搬机器的事情啊。厂里搬过好几次机器了，我们还拍了照片。我也用手机拍了照，拆机器的时候照了，吊车搬机器的时候也拍照了。现在照片都删掉了。

老板在惠州还有个工厂。我还去那边帮过忙，怎么会不知道他搬厂的事情。我们厂里技术好的人会被派到惠州，因为那边有些技术上的事情搞不定嘛。

2012 年年前，厂里就搬走了一些机器。年前厂里招聘新员工，但是很多人做了几个月就走了。我们厂规定辞工要提前一个月说。这几个月，有人辞工，我们就放走。这种事还不是组长说了算。组长跟上边说，某某员工做事不好，辞工就放走，上边就会同意的。

年后头一天上班没做事，抽奖发红包，全厂开大会。二老板跟全厂员工说，工厂今年可能会搬走，但可能留一部分在深圳继续生

产。

罢工前，厂里已经搬了两次机器。

厂里的订单就转到惠州了嘛，我是组长，当然知道了。订单拿来，就放在我的桌子上。员工抱怨加班少了，就来翻我桌子上的订单。后来有的订单本来拿给我了，但是没有做，又拿走了，所以都知道把订单拿到惠州去做了嘛。订单好像从三四月份就开始转到惠州了。

老板搬机器，又说要搬厂，其他什么也不说。员工心里肯定不舒服是不是？大家肯定都不舒服，尤其是老员工们。

我以前也上过学，这个（罢工）就像那时候交团费一样嘛，大家自己都有出钱。罢工要喝水啦，七七八八的啦，要花钱的嘛。罢工前，每个组长都去收钱，收自己那个组的钱。很少有没交钱的。没交钱的那些人，罢工后都补上了。每个人最少交 10 块钱。

罢工前我们就跟员工说，现在都是为了自己，不要说哪个人是代表，每个人都代表自己，罢工时一口声说没有代表，大家都是为自己的。

罢工前，我们这些组长也在一起简单地商量过这些事情，老吴那个时候还提醒我们，不要跟员工说，因为怕有人告密。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计划，就是商量好，厂里在拉机器的时候，等他把机器装到平板车上，我们就不让他走。

我们也听别人说过，有的厂罢工一两个月，员工就天天在那里晒太阳，很辛苦的。特别是做老大的，要一直鼓励他们，告诉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都要努力坚持。

打工这么多年，工厂如果搬走的话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厂搬走之后，再去惠州找老板就没人搭理我们了。

罢工那天，搬机器那个部门，啤机部，就是有大的注塑机那个部门，老员工有人知道当天要拉走机器。因为做得久了，就会知道

这些事情。知道今天会来拉，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。

罢工前已经搬了两台到惠州嘛，一台大的，一台小的。员工都是这样想，等他再搬几台过去，那边（惠州）就可以生产了，这边的人全不顾了。再拖几个月，没班加，1600，很多人就要辞工走了。



我们厂大部分人上白班，要上夜班的只有三四十个人。注塑机部门两班倒。

工人和厂方的冲突

那天早上九点半，吊车把啤机装上车了，我们员工就从车间出去把门堵了，不让车出去，开始罢工。车间里只有很少的人还在做事。第二天还有人在做事。厂房有四层楼，每层都有一个主管，主管都没有参与罢工，他们就站在那里看。有些中立的组长也没出来，坐在车间里玩。

主管都不敢叫我们去上班。主管为老板，都不为员工，从来不提员工的福利。很多厂有工会，我们厂连工会都没有。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进过一个厂，有工会，搞员工福利，生日晚会，或者过年过节发点什么东西。这个厂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连这里的镇工会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员工连“工会”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没人理解“工会”是什么意思。

主管给组长打电话，我没接。主管平时对我们不好，这时我们都不理他。（以往）我们跟主管提涨工资的事情，主管（总是）说，

你们事情都没做好，跟我们谈什么东西，很凶。他既然一口咬定，我们就没话说了。

罢工第一天老板不在，好像是第二天来的，我也忘记了。经常是车在，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

罢工后，二老板的秘书从写字楼里下来了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让工人回去老老实实上班，有什么事等老板回来再说。秘书好像比老板的权力都大，主管都听她的话。以前她管得少，现在行政部都归她管了。

有人说秘书是老板的情妇，这个东西不能乱说的，你没有证据，都是猜测。她是有个小孩，但是没结婚。我们不管别人的私事，是吧。我们只管公司的什么事情是她处理的。私人的事情对我们也没什么，影响不大。

我们人多，七嘴八舌，就把她哄回去了。人多，她听哪个的？我们说上班有什么用，没班给我们加，在深圳怎么活，每个月才一千多块钱；你们偷偷搬机器不行的，本来说的现在不搬厂，怎么又提前了；员工心里都不舒服，现在就要搬空了，让大家怎么做事。罢工前的一个月加班就少了。

老吴印象

开始我也不认识老吴，他是三楼的，我是二楼的车间。但是我见过他在我们厂门口不远的那个路口发那些宣传法律的单张，什么劳动合同法之类的。厂里很多人都见过他在那里发的。后来认识了，有时上三楼的时候，也会找他说话。

老吴是普通员工，天天在那里做事的。平时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像我们组长那样有时间去组织什么东西。再说了，让主管看见怎么办，你不在那里做事，到处跑干什么，是不是。

罢工头一天也没听到他说什么话，堵车的时候也没看到他。

罢工以后，有几天员工气馁了。政府都不理我们。老吴作为一个工友，跟我们组长一起鼓舞大家的士气。毕竟我们在那里说一下，员工也听的，是吧。

有些员工还是懂那些事情，说我们肯定还要守住啊，要有个交代，等大老板过来跟我们对话嘛。员工就这样说，我们有权保护老板的财产；他把财产拉走了，我们有什么保障，什么保障都没有。有的员工比我们老大懂多一点，想到一些事情，就叫我们去安排。是吧。

开始那几天，老吴没有当众讲话。后来谈判，老吴也做了代表。老板过来，说不跟我们谈了的时候，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，就安慰我们，跟员工代表坐在一起，说说话，劝导我们一下。

以后每次劳动局的人一来，就冲老吴喊来来来，就让他去谈判。

有一天我看到派出所的和劳动纠察的人来了，叫老吴去，说老吴说的话员工才听。老吴说他不是组长也不是主管，员工怎么会听啊。那些人还是说，员工全部听他的话。老吴说员工不是听他的话，而是信任他。开始那几天，派出所的都是这样，一来就叫他去。为什么要专门找老吴？就是因为感觉老吴说的我们都听。那几天，老吴经常叫员工不要乱来，不要做什么（不合适的事）呀。派出所觉得他好像就是个头一样。

其实我感觉，他又不是组长，又不是什么，下边的很多员工，根本不认识。我感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识他。

那几天，有个工友天天在厂里等，心脏病发作，晕倒了。我们找车送他到医院。

一个犯众怒的警察

有一次一个人开着警车，穿着警服，腰里系着武装带，里面好

像还带着枪。他一来就气势汹汹地说是代表政府来解决问题的，要我们找代表出来跟他谈。我们就让老吴去，老吴恭敬地用双手把写着工人要求的纸递给他。他一把抓过来，看都不看，就扔到地上，还很凶地喊：“你回来！”

哪有这么凶的警察，还为人民服务呢，看他他是为自己服务。有枪又怎么样，我们不怕，我们又没有犯法。他一个人，敢开一枪试试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肯定要打死他。



我们都很生气，把他围起来，让他跟我们道歉。我们问他：“政府的人就是这么为人民做事的吗？你到底是不是政府的人？”他就躲到写字楼里，后来他试图爬围墙出去，但都没成功。

开始我们怀疑是老板叫他来吓唬我们的。后来我们见了派出所所长，问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警员。我们说：“你们找个黑社会，给他配把枪，那就不对了。”所长说：“我回去开导开导他。”

来了黑社会

劳动局的人开始来了，忽悠我们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部门的。开始来的几个人没有穿制服。他说他是什么什么的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嘛。他们是来了，后来还把黑社会也请来了，跟在屁股后面，屁颠屁颠的。我们齐心，不让他们进来，他也不拿证件给我们看。我们那天是做了有点过分的事情，不让他们进来嘛。秘密调查也要告诉我们知道嘛。

具体是那一天我忘记了。请那些人来，拿着棍啊，拿着叉什么

的。我们说，我们这不是闹事，你们最好不要进来。我们堵在厂门口，不给他们进。可能是深圳的巡防队什么的，杂七杂八的，有的没穿制服，就拿着棍棍棒棒的。我说我们又不是打架，又不是闹事，为我们的利益；我们也没打老板，没动厂里的一个纸箱，老板的东西我们没有砸，什么东西都没动；我们只是堵住车，也没有要砸车。那天来了十几二十个。我们说，你最好不要进来，要是进来打人，我们是不肯的，我们这两三百人会跟你还手的。我们不动手，你们拿那些东西干嘛。我们要是拿着棍子什么的，你们来镇压一下，派出所什么的来，还可以说的过去。在现场的员工都是空着手的。

听他们说行政部有个女的，拿着钱去给那些人，被员工看见了。我没看见。请他们来了，肯定要给钱的嘛。就是吓唬员工，看员工能不能吓唬一下。给了钱，他们就走了。他们在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，就走了。那时候大老板还没来呢。

后来大老板来了，跟我们解释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还是好好做，我们没有搬厂。他说我们只是搬了一台机器。我说，你去年搬那么多机器怎么不说呢？要是只搬了一台，我们就不说了，那车间全部都搬空了。我们人多，老板被轰下来了，就跑了，不来了。

选代表谈判

后来，他们经常来谈判，就让我们找几个代表。我说，员工都怕，要是把几个代表轰走，或者给钱让他们走了，怎么办？我们都没有代表。本来员工心里都这样想，你们七八个人去，老板一个人发一两万块钱，走了，下边员工怎么办；到时候，老板不理我们了，政府也不理我们了，我们饿死怎么办。员工就这样想的。

他们还是让我们选代表，说我们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不清。老板说两句，就被轰下来了。人多意见不统一。劳动局那几个人天天

来。他们说他们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老板说没有搬厂。只是这样回答我们。后来才来了两个穿制服的，不知道是哪里的。一个高高大大的，袖章上写着“劳动纠察”，不用说肯定是劳动局的。

开始的谈判我没参加，最后几次才去。

那一次，老板说：你们那么多人七嘴八舌，一句我也听不进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，你们要选几个代表。

劳动局，派出所也这样跟我们说，不可能 300 个人挤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。

有的员工就说，我们没代表，一个个的进去。

劳动局的就说，不可能让你们每个人都进去，人民大会堂可以，我那个办公室容不了那么多人。

进去了，你也知道，派出所怕工人砸东西，怕有的员工兴奋了，做出什么事情。

最后，选了 8 个代表。有两个大姐和老吴是普工，剩下几个是组长。老吴应该是每次谈判都去了。员工开始推荐老吴去的时候，他也有点不想去的。他们员工叫谁去，谁就去。两个大姐代表女工，她们做了好多年了嘛。还有的人说叫几个组长去就可以啦。

选上的代表们让我们这些剩下的组长看好员工，要员工不要闹事，不要砸东西，那样不对。员工兴奋的话，砸东西，那样不好嘛。

后来谈判破裂，派出所和劳动站的人就见过老吴跟工人讲话嘛。一直有人在旁边，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派出所的人就拿着手机拍，做证据什么的。你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录下来。

开始两三天平平静静，后来搞得那么久了，都晒的那么黑了。

我们在厂里喝水，老板的秘书把电源拔了。我们员工喝冷水，拉肚子怎么办。我们就跟派出所的人说，这人小气的，就一点电费嘛！水是我们自己买的喔，我们没喝你们厂



里一点水。本来有的员工肚子不好，喝冷水不舒服，我们插一下电，有热水喝，你拔了……我就对警察（等等）说，我们罢工这么多天，你们不给我们处理，再大的老板你们政府也可以压他啊，政府就由着他乱来，这么多员工等着吃饭。人家可能一个人养着一家三口。

我们就是这么说，谈判前也跟他们这么说。反正政府也来了，劳动站的，他们什么东西的也来了。反正我们也不熟悉。镇劳动局的那个人，高高的，来了几次，我们都认识他了。

他们一来厂里，都是一些员工或者我们几个组长围上去说，老吴没有去说过。只是后来选代表谈判了，经常会看到老吴跟我们谈心了，看到他坐在中间或某个位置，看上去员工好像特别听他话，所以那些人每次都找他，有时硬拉他过去。

谈判前商量好了，有什么要求打印出来，清清楚楚地给老板看。就写偷偷搬机器，员工心慌，没心情做事，我们员工要求几点……

第一条是关于补偿金的，老板说他不能答应这个。第二条是高温补贴，然后是养老保险。他就答应了后边那些。我说那些是小数目，员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条。重要的他不答应，次要的他答应了。

老板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劳动局要他做，他不可能不做，是不是？比如那个养老保险，人家要买，他不能不买。老板答应说几年前的养老保险都可以买。但我们没有钱嘛，自己都要交一万多。

罢工三天后，大老板来了一次，被我们轰下去了。后来他就到劳动站那里跟我们谈了一次，不到几分钟就出来了。他没有谈，他要我们找他的律师。他说我跟你们没得谈。他开始说赔补偿金 300 块一个月，代表就不行。老板就推辞，说自己感冒了。当时厂长也在，厂长还说老板确实感冒了，不能谈。然后就跟律师谈。讲讲讲，讲到 500，员工就发脾气了。当时外边很多员工在等消息，本来想着很有希望，谁知道大老板一出来就跑了（以后一直都没看到他了，不来了）。看大老板几分钟就出来，不用说也知道没谈成。后来听代表出来说，最高只给 500。

第一次跟大老板谈判我没去，后来几次跟二老板谈的时候我去了。秘书经常下来劝我们。她打出个通告贴在墙上给我们员工看。上边写着要买养老保险的，可以拿身份证复印件……员工想，我做了五六年，七八年，那要交多少钱啊。

劳动局的跟我们说老板不搬厂，让我们放机器，回去工作。

老吴也劝大家把车放走。那个时候有人就怨老吴。我就说人是你们选的，现在又抱怨。员工不想让车走的。那时员工之间也有吵。有人怪放车，有人怪七七八八的事情。放车时也有吵，有人说行，有人说不行，很乱，也听不太清楚。

后来，老板又让车来拉模具，有员工很激动，还把车胎的气放了。

政府劝我们去劳动仲裁。劳动局还派人到我们厂里调查，问有没有拖欠工资，加班费是不是合法，等等。员工怕劳动局的人借着调查，把厂里的什么重要资料拿走，就堵着他不让走，要检查他带的东西。

去市政府上访

第一次抓人的时候没轮到我。自从镇政府抓我们那次，我们就劝员工不要去镇政府，但是大家起哄说，镇政府抓了我们一次，现在堵路都不理我们，只能去市政府了。

去市政府上访前一天，有一个戴眼镜的，是个书记——是政府的还是劳动局的我也记不清了——他来厂里劝员工们不要做出格的事情，因为那天大家都喊着去市政府嘛。毕竟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事，今天游行，明天去静坐，后天去……所以他们经常派人跟着我们。

我们游行的时候打着横幅，上面写着黑心老板什么的。以前有

的横幅是用手写的，后来员工说手写的容易掉，让我们几个代表去做了一个印刷的、红底白字的那种。横幅是我保管的。

那天一大早，有员工跑来找我，让我把横幅拿出来。他们说马上就要游行去市政府。我说去那里干吗，那么远，走到晚上也到不了。我劝他们不要去。我还跟老吴说了，让他也劝员工回来。我还说，又不是中国跟别的国家闹矛盾，跑出去做什么。

有的员工听说马上就去市政府，很兴奋，还说去市政府吃饭了！我说这次可能没饭吃喔。几个大姐在那里叫，说谁不去谁是汉奸。

还没出厂门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找不到政府的，就算找到了，也到了晚上，天黑了，人家都下班了，你们还找谁。有员工说我们能等吗，都这么多天了。

那天老吴也不想去，但是他为员工着想，担心大家在路上出事，就跟着去了。他不是为自己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来有一次谈判结束后，听人说老板想给老吴 11 万买通他，叫他不要管这些事情了。老吴做人很老实，如果是为自己，早就拿钱走了。谈判的时候他也不会激动，很冷静。我去过老吴家，他家里都没有装修，负担也挺重的。

老吴一直没有让大家去做那些事。游行、静坐还有最后去市政府都不是他的主意。他从一开始就说，要是去找政府也可以，但是只能选七八个人去，让代表带着员工们的委托信和诉求书去上访。

员工都说七八个人不行的，人多力量大。我们的事情，五六个人，七八个人，去找各种部门好多次了，没用的嘛。找到一个部门，把诉求书交给他们，他们就放到一边，有的还不受理，回来后也没有音信。政府的人尽给我们拖延，踢皮球。有一次去派出所，一个所长说，这些事不归他管，是另一个所长管的。我们再一问，原来那个所长出差了。他就是故意敷衍我们。最后，员工越来越激动了。

游行去市政府的路上，防暴队一直跟着，劳动站和派出所的人也跟着，出了镇，他们就没跟了，换了另外一个劳动站的人和派出

所的人。路上他们一直劝大家回去，没人听。高速路那里刚好有个缺口，那些武警就赶紧跑到我们队伍前面，拦住了去路，然后就把我们围住，往那个缺口里赶。有的员工不服气，那些警察就开始打人。有一个大姐在里面向警察丢饭盒，特警就过来抓人。我们镇的那个警察指着老吴喊：“他在这里！他在这里！”然后特警就过去抓他，几个工友就胳膊挽着胳膊挡在老吴前面，不让他们抓，但还是被特警抓上了车。我们也被全部带走了。

结 局

有人被送到医院，有的是被打，有的不是。走了三个多小时，可能是太累了。听说在医院，有个大姐激动得要跳楼。

录口供的时候，警察问我是哪里的，我说是广西的，他就说他女朋友也是广西的。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……他就凶起来，吼道：“坐！”我说不敢坐。他说让你坐你还……那就坐地上！我说凭什么听你的，我又没犯法。

他们问我谁带的头，有多少人。我说没人带头，我们大家自己要走路去市政府的，人数有两百吧。他们还问了厂里失火的事，问是不是我们放火。我说我怎么知道，着火时我们都在外边出租屋里。

然后就给我一张打字的东西给我按手印，打印了几十条。我说看一下，他们不让看，让我快点按手印，十个手指全部按指纹。

我就说了几句话，他就打了那么多，拿着我的手按了手印。我都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东西。

我第二天就放出来了，关了七天的是拉横幅的，还有两个关了一个多月，一个大姐用饭盒砸特警被拍到。一个大哥是带大家喊口号，他声音大个子高。我们在路上喊：“黑心老板！”不知道老吴怎么关了这么久。

我们也控制不了员工的情绪。当时我就说现在堵路不行了，用过一次了，不能再用两次，三次。政府第一次让特警把我们扛上车的时候已经很激动了。

最后我们都被抓到派出所，跟着我们走了三个小时的所长说：“你看你们，走了三个小时，害我也走了三个小时，现在好了。蹲在那里不要动！那还有饭吃！”

我们也去咨询过，建议是，一不能有过激的行为，二可以通过发微博把厂里的事告诉给更多的人，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不做过激的事情，外边的人都会支持的。

早年打工经历

我 1997 年出来打工，进了一家中山的厂，有 1000 多人，生产相机。我在那里做了两三年。厂在开发区，开发区派一个厂长进去，再派一个工会主席进去。那个时候加班费 3 块钱一个钟，大米才几毛钱一斤。厂里有工会，工会主席年纪蛮大的，四五十岁的样子。那时厂里一年四季很少招工。

厂里搞员工生日晚会，有时 2 个月搞一次，有时 3 个月搞一次。员工就都发瓜子，组长发衬衣。那个时候，开发区还搞什么十佳人才评选，每年都评。记得奖金是 2000 块。

记得有一次厂里另一个部门出事故，一台注塑机失灵，有个员工手被压住。他们搞不定，就打电话给技术员。搞了一个多小时才拿出来。当时说肯定压断了，让他拿出来，他不肯，就在那里哭喊，一个组长架着他。最后机器打开，只剩下渣渣了，那个手就像个网一样的东西，变成肉酱了。后来大家还捐了钱。



“关键是政府也骗我们”

——烫金部工人何大姐访谈

我是 2008 年进 D 厂的，在二楼烫金部当员工。罢工前，从没见过大老板。

二老板对全厂员工说要搬厂，原因是现在的厂址要修地铁。二老板说要搬到深圳市内的某个地方，还没确定具体地点。但我们都知道老板在惠州有个分厂，过去老板也往惠州搬过机器，四楼都搬空了，一楼也搬了一半。

罢工开始那一天，有个员工，好像是一个清洁工，上来告诉我们二楼的人，说一楼在罢工，我们就从窗户往下看，果然看见厂里在搬机器。我们一听，谁也没心情做事，都下去了。三楼主管是两公婆，四楼主管也是两公婆，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参与罢工。还有写字楼的那些妹仔，我们罢工的时候，她们还在做事。

我们在办公楼下坐着，等老板来谈。厂里把车间封了，不让员工进去。我们在门卫的饮水点打水喝，结果厂里就把电源切断了，不让我们喝热水。

我参加了第一次谈判。老板那边来了三个人，还有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。我们工人代表就是站在那里，也没怎么说话。谈了不到五分钟，二老板不承认搬厂，就走了。政府的人说需要调查一下。

过了几天，大老板来了。记得那天下雨，他在厂里的铁皮房前面对我们说：“谁说搬厂的？”我们说：“二老板说的。”大老板就不搬了，延期两年，你们回去好好做事。我们不信，说：“厂里面都在搬机器了，搬完了还怎么做事。”大老板当时就走了。

罢工刚开始的时候，政府、老板的人来厂里，我们这些老太婆就围着他们，七嘴八舌的。他们就要我们选代表。有一次，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开着车来厂里面，一下车就说是代表政府来解决问题的。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开始跟他说，他让我们选个代表，大家都让老吴当代表。当时好多人都不认识老吴，罢工后，我只知道别人叫他的外号，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名字。谈判时，我们就叫老吴代表工人去谈，因为他说话清楚一点。

老吴有时候会站在高一点的地方，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要齐心，努力争取赔偿。”他不是自己主动要说的，都是工人让他出来说话，他才说的。

我们被政府骗了两次。第一次是政府的人打包票说，只要我们放了车，让厂里把机器拉走，老板就会跟我们谈的。因为拉机器的车是租来的，老板很着急。政府的人也说老板租车一天很贵，要 5000 多块呢。

政府的人还写了字据，我们让他们盖章，他们说没有章，让工人相信政府不会骗人。虽然我们都很不愿意，但也不想跟政府闹翻，就把车放了。结果老板还是没有跟我们谈。

还有一次，厂长从惠州带了一个美国客户过来。美国客户会说中国话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美国人来干什么。厂长跟工人代表说不搬厂了，还要我们赔偿工厂不能出货造成的损失。我们就不放厂长走。政府的人也在场，又打包票说，明天厂里一定过来谈。结果第二天又没来。

这次罢工拖了这么久，关键是政府也骗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求助于政府的嘛。

去市里的头天晚上，很多员工商量着第二天去市政府，都是些老太婆、老太公在那里商量。老吴没有要大家去市政府。第二天早上八点出发的时候，有的老太婆就在那里骂：“今天谁不去谁就是汉奸，不去就不行，以后老板赔钱不给你。”当时我看到老吴是不想去

的，是那些女工把他骂出来的，他只好跟着大家去。

那天太阳很大。走在去市政府的路上，我们很渴，我就在那里哭。我跟尾随工人的特警说：“你们都是有爹妈的。你们的爹妈在外面受欺负，你们忍心吗？”一个特警还把他自己带的水拿给我喝。

走在半路上，我们被警察围在高速路口。老吴让大家唱国歌。后来大家就被警察抓走了。我关了十天。给我录口供的时候，派出所的人问：“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”我说：“认识。”他就把我的手指在文件上按个指印，然后又拿着我的手，让我在一张不知道写着什么东西的文件上打指印。



“有的代表经常讲要守法，都有点过头了”

——型材部工人姜大哥访谈

先说说 D 厂

我们厂人最多的时候有一两千。据说大老板起初在香港混“江湖”的，九十年代到大陆开厂，从小厂起家。大老板在山东开过厂，因为气候冷，产品生产需要高温，就转到惠州。现在惠州的厂房是老板自己花钱盖的。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弟弟，有个女秘书，平时处理厂里的各种事情。企业法人是个女人，据说是这里村长的前任老婆，这里劳动站站长好像是她的妹夫，要不就是小舅子。老板下边就是主管，然后是助理，下边是组长。

我 2004 年进 D 厂，2005 年辞工回了一趟家，帮人做建筑，搞木工活。同年又回厂至今。厂里两班倒，计时工资，部分现金，部分打卡，工资条你要他才给你。厂里有几个部门：型材部，啤机部，等等。我在的型材部门有三个组。

2007 年以前进厂的有全勤奖，2007 年以后进厂的没有。宿舍免费，水电 30 元，但是住在厂里的人不多。2004 年包吃，2008 年工资涨到 900，就不包吃了，改为 270 元一个月，管三餐。现在改为临时买餐票，5 元一张。涨底薪后，原来一个人开一台机，现在开两台；实行扣分制，做坏东西严重的扣分，每扣一分，罚款 5 块钱。二老板经常去厕所抓吸烟，抓到罚 100。按工龄累计发年终奖，做

满一年 200，一年加 100，最高为 600。去年取消了年终奖。罢工前工资大概为 2500-3000。

我们厂每年有体检，医院的车开进厂，检查心肺功能，血压什么的，要自费。厂里也有受伤的，伤到手指，老板赔了一万二。

平时车间很热，有风扇，没空调。我们都不知道有高温津贴。这次罢工期间，代表提出要高温补贴五百元，老板后来给了，还给了带薪假，补了去年的高温津贴。我小学二年级没毕业，法律啊什么的都不懂，直到后来罢工的时候，听代表一说，我才知道还有那些东西。

以前厂里没有过罢工，但是小冲突就有。2009 年左右，有六七个河南人，年龄不大，经常打架，在食堂就打过。他们有次发动车间罢工，说谁上班就揍谁。老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，但是后来还不是一个个被搞掉。

过去厂里保安很嚣张，2004 年那时候经常打人，比如食堂有人插队，保安就大骂着抢工牌，敢还嘴就用对讲机叫一群保安来打人。还有，那时过年前，大家玩得回去晚了，保安不让进厂。后来保安发展到学着黑社会在厂外巡街，结果保安队长被挑了脚筋。再后来保安就比较老实了。在厂里，保安有老板撑腰，到外边打架与老板无关。在外边惹事被打了的保安，老板就会赶走他。听说惠州厂那边跟深圳这里 2005 年差不多，（保安）会打人的。

2006 年，有个工人到另外一个车间领料，被巡视的大老板看到，大老板说他在那里玩。他顶嘴。大老板说信不信老子打死你，然后就动手打人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

我们厂里以前也有偷东西的。200 块的木制相框，有个人一次偷了 6 个，那个时候工资才 700 块一个月。那个

人后来被发现了，没拿到工资就走了。

四川地震的时候厂里让捐款，捐了两次，第一次自愿，第二次强迫。我们主管是四川的，指定金额，员工最少 20 块，从工资扣，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。我们老家也捐款了，按人头收，10 元一个人。

2008 年危机没有影响到订单，但是深圳很多厂倒闭。这个厂慢慢正规，差不多很多地方都完善了。

2013 年春节后，二老板开全厂大会，说要搬去惠州，愿意的跟去，不去的结工资。年初已经只有四百多员工了，五年以上工龄的超过半数。90 后很少，女工多为 30 岁以上的。

罢 工

我们罢工那一天是老板第三次搬机器。前两次我们也都知道，但没人动。

罢工前两天，一个助理的老婆，也是女工，在车间里挨个人征集签名，收十块钱。问她干嘛，她说要罢工了，罢工要水喝吧，不是一两天的事，需要集资。我第一次听说罢工，给钱了，也没觉得惊讶。当时也有人没给。

玻璃部带头罢的工。那一天，老板又找来那种大平板车和吊车，在我们车间搬机器，一些机器都搬上去了。但是我们部门没人动。玻璃部的人到我们车间送料，应该看到搬机器了。我的组长对大家说，外面在罢工，都出去，但是组长自己没有参与罢工，没出去，待在车间。组长还让我转告夜班的人，让他们不要到车间里来，因为主管在，进了车间就要开机器了。后来组长去惠州厂了。

老板找来的吊车是租的，按小时算钱。我们把两辆车堵在厂里几天后，吊车司机还跑来要强行开走。我们说要开就从我们身上压

过去，那个司机就怂了。

因为租的车被堵着，大老板才从惠州过来，跟几个代表谈。代表说：“老板答应赔四百，我们先表示出诚意，然后再慢慢谈，争取赔 1600。”代表说先把车放走，表示诚意。我们当时也有人反对，但是代表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们都很相信他们。老板是奔着车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。代表说，老板同意谈了，让了一步，同意给 400，也要求我们让一步；我们也要表现出诚意，拿出诚意，然后慢慢谈。谁知道放了车，老板就不理我们了。

罢工期间，我们在厂里守着，厂门口也有人守着。夜里守机器的工人，到凌晨一点，有个面包吃。忘了是哪一天了，有一个警察，四十多岁，穿警服开警车到厂里来，边说边开着车进了厂里，说“我代表人民政府，有什么要求跟我说”。他要我们找代表出来跟他谈。老吴把书面诉求拿给他，转身就走。他都不看，很凶，大声指着老吴说“你回来”，要抓人的样子。老吴说我不是代表。大家很生气，就把警察围起来，不让他走。他被围在厂里，三次想翻院墙逃跑，但是翻不出去，我们没人拽他。后来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，还是让老吴去跟他谈。后来他们跟老吴到办公室谈了很久，写了一个东西说保证解决，警察还说他“发高烧了”，其实他想跑。^①这样我们才让他走。我当时还打了 12345，想证实一下那个人是不是真警察，怕是老板找来骗我们的。

还有一天，我们正在厂里玩。我听有人说，黑社会来了，就去看，发现厂门口有十来个身份不明的人，没看到带家伙，但肯定有备而来。我们人多，他们看看就走了。在老家也见过（这种人）啊，带着东西冲过来打，但是他们没有。

有一天厂里失火了。以前我们打电话记者都不来，这次来了。我们给他讲罢工的事情，他竟然问是不是我们放的火。后来听说新

^① 这段讲述，与吴代表所讲述的有出入。参见吴代表访谈中“罢工第 1 天”的相关部分。

闻报了，但只有失火的消息，我们讲的罢工一个字都没有。失火的时候，保安挡在外边，不让工人靠近。那个时候报警没用，只要是我们的工人打的电话，他们都不理。谁知道这次是着火，等消防队来了，都烧得差不多了。

罢工的时候，有个河南人经常发牢骚。他反对代表放走搬机器的车。他还说应该到外面，去政府请愿示威。他也参加夜里堵门的值班，平时就开黑车赚点钱。他认为我们不值班的时候应该出去赚钱。代表认为大家应该聚在一起，不能散。代表让放车的时候，有河南人骂。开黑摩托的河南人不知是不是骂人的那个，他说，光等有什么用，不如出去挣钱。罢工期间基本上没什么人出去挣钱。

文员一开始在办公室呆着，没事做。我们在院子里喊叫，他们还爬窗户看。后来厂里让文员下车间做事。拉上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，不需培训。

有一天（忘了哪天），我们把法人代表围在办公楼里。围了几个小时，后来下班了，我们把文员放掉了。围办公楼的女工多。她们说：我们都没饭吃了，还让老板吃饱饭对付我们？那时候，一呼百应。

罢工期间，工龄两年以上的没有一个中途辞工走掉的。

谈 判

第一次跟老板谈判，我们有8个代表，有组长，有普工。

大老板跟代表谈的时候，要求工人都回去上班。代表说怎么可能，都这么久了。还有一次大老板当众讲话，要求工人回去上班，承诺暂时不搬。工人要求他把机器搬回来，他说不行。工人们很生气。老板说你们七嘴八舌的，我听不清楚，你们选代表出来跟我谈。老板讲话时，厂里也有警察在现场。没人骂老板，也没有威胁到他

的人身安全。钱在他兜里，我们总不能抢吧。

每次工人集会，都是老吴在讲。代表领工人去镇政府静坐，老吴在厂里，电话提醒我们，说只静坐，不要堵住路。

在镇政府静坐那天，有 100 多人，老吴没去，他在厂里。但是后来政府出来说我们违法，警察也来了，要抓人。那一天搞到晚上 10 点多。后来政府还给我们水喝（忘了有没有说给吃的了）。静坐的时候有的人一看警察来了就跑掉了，有害怕的。老吴说去了



不要乱来，只静坐，不犯法。主要是他懂法律。他还说不要做输理的事。他懂那些法律条文，要是现在出来，站在那里，还会有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，我也会。

我们的代表一直劝大家不要冲动，要理智。我平时跟代表没来往，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，不知名字。这次罢工才认识，一辈子也忘不掉。我内心讲，很崇拜他的。罢工后，我们在一起吃过一次饭，有三个组长，那个代表和我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罢工时我就像根棍子一样，代表指哪打哪。

有的代表经常讲要守法，感觉太配合政府了，都有点过头了。

去市政府

最后一天集体步行去市政府，路上遇到防暴队，最后有 3 个被刑拘。其中一个女工，她把手里拿的饭菜扣到了一个“黑皮”（联防队员）身上，被抓后说这是“袭警”。那个女工我们在厂里守机器的时候，都要带饭的，所以那天去上访就有人带着饭。

我们以为不会打女的，就决定游行时让女的在前面。女员工不少，大都 30-50 岁。

我被抓后还在想，出来后要不要继续罢工。派出所里没打人，只有一个警察审问我，有半个小时，问我是否自愿罢工，是否有人指使，没问老吴的事。我说是自愿的。我是拿标语的，警察指着照片上的我问是不是我，我说是。他用电脑做记录，然后打印给我看，要我按手印，我都没看就按了手印，没文化，看也看不懂。审问我的警察态度还好，就是那些看管我们的治安仔态度恶劣。上街走在前面的十几个人全部行政拘留十天。最后一天上访被围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人有的想要冲出去，但冲在前面的人被打了，而且被关的时间长。我和我老婆没被打，我也是在前面的，但是我老婆把我拉住了，要不我也冲过去了。我这个人很冲动的。政府把走在前面的工人全都拍照了。

印象最深的事情，就是抓人的时候像土匪一样。

进出派出所

在派出所，警察吼：“全部坐好，你们以为是来过年的！”

派出所里伙食很差，米饭扎嗓子，包菜和白菜用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。饿得要死也吃不下。待了十天，我肚子上的肥肉下去得很快，出来的时候小肚子都没有了。那里边减肥不要钱的。我们两个工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，里面还有其他人，吸毒的，小偷，违章驾

驶的，打架受伤的一个也给关进来了。有个小子还想欺负我……

最后，有的人被打，很多人被关，都怕了。

被抓后，大多数人是第二天晚上放出来的，出来的人中有提议集资，帮老吴请律师。也有人（不知多少）不出钱，那些人没良心。最后集资 2000 多。现在都怕救不了他，自己又搭进去。

现在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这一带，但是没有老吴那样带头的了。最后签字证明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愿意来，怕了。

有不少人担心（再闹的话），搞不好老吴不出来，自己也被搞进去，就糟了。打人事件后，大家都怕了。我们是弱势群体，出来打工不是斗气的。

我堂弟在东莞开了个小厂，他都说他跟当地派出所很熟。我们这个厂的老板，在这里根深蒂固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尾 声

我在的部门效率高，废品率低，因为工人是熟手，管理也懂生产。惠州厂效率比我们这边低，所以老板也不可能把订单全拿到惠州去做。这事（罢工）结束后，管理叫了几十个人回厂，还把几个拿了补偿离厂的调机师傅专门返聘，工资 3200，包吃住，让大家拼命干，补回罢工的损失。

我这个人比较直，没念过书。女儿上高三了，在武汉学美术，学费就 7 千，刚给她打了 1 万 1 千元。我爸妈都 70 多岁了，我负担很重，否则可以更积极帮助代表。



现在我要考虑个人问题。我老婆跟我是一个厂的，她昨天才找到工作。我现在找了一家五金厂，五天 8 小时，没加班，工资 1600 块，压力大。我今年 46 岁，年龄大了，用我弟弟的身份证进的厂。

“员工好有什么用，老板是没良心的老板”

—— 廖大姐 访谈

罢工的开始

我 2007 年进 D 厂，开始在二楼型材部，今年被调到一楼开啤机。工厂 2007 年之前就在搬机器。以前二楼有 43 台塑胶相框机，2010 年全部搬走了。烫金机也搬走了十来台。做了这么多年，每年都在搬机器。

2013 年发红包的时候，二老板对全厂的人说，下半年工厂要全部搬完。厂里一直招不到人，好像贴了什么通告，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。有人说不搬机器了。然后厂里招了很多临时工。我们做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厂里要怎么样，老板应该跟我们说一下嘛。

罢工前，搬了两次啤机，一次两台，一次一台。我们以为老板会给我们什么说法，可是一直也没说什么，就是搬机器。整个四楼都搬空了。

罢工那天早上拆了三台机器。拆机器那天我正在开 5 号机。早上开早会，组长说做完数量，就拆机器。主管让拆机器，我们哪敢说什么。在哪个厂都是主管最大嘛。

啤机一装上车，我们就做不下去了，出去把车堵了，不让开走，让老板给个说法。然后二楼三楼的人也都下来了。我们厂 400 多人，几乎全都下来了。组长们站在写字楼那边看着我们。我心里想，当

官的肯定应该都知道这些事。

二老板的秘书出来，问我们想干嘛。我们说，想让老板给个说法。秘书让我们先把机器放出去。写字楼办公室有个职员，当时还给老板打了个电话。

后来从写字楼搬了一张桌子出来，让要辞工的过来登记，可以立刻结工资。当时有一些人走了，都是临时工。走了几个我就知道了。反正有人走了，看见他们过去签名字了。那些临时工说，反正到哪里打工都一样，就走了。这下我们更奇怪了，我们只不过想要个说法，怎么就要让人辞工。

我都记不住是第一天，还是第二天呐，来了一个警察，你不知道，那个警察凶死了，我们要他向我们道歉。

二老板的忽悠

第一次劳动局来了三个人，没穿工作服，穿着便衣，说是劳动局监督办的人。我们要他们的工作证，他们不给。我们都不相信他们，不让他们进来。他们说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。我们问怎么解决。他们说按劳动法，一年给一个月的平均基本工资，还有高温津贴什么的。他说要到36度以上高温津贴就有得赔，没有那么高温的就没有，而且是在没有办法把那个温度降下来的情况下。我们开啤机肯定是高温的。很多人围在那里问他们。

我也问过那个劳动局的人，劳动法是不是只适用于某个地方。他说不是，全国都一样的。反正离开这个地方就要赔偿。劳动局就这样说哦。

老板第一天没有出来。那些政府来的人去办公室找秘书什么的，但是怎么谈我们不清楚。他们到办公室里面，呆了很长时间的嘛。

那些劳动局的人天天都到厂里来。罢工第二天就来多几个啦。我们罢工一直到最后，我都没看到过他们带工作证。

第二天，二老板来啦。他说机器搬到哪里他都不知道。我们就问他，你的机器搬到哪里你都不知道吗？虽



然我们是员工，但是我们也是这个厂的一份子。他说搬到哪里他现在还不知道，现在还在找厂房。老板这样，不是忽悠我们吗？这些话是二老板亲口说的哦。

我们就问他（我们好多人，好齐心，那个声音好大）：“老板，你是不是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？”我们就这样大声叫了嘛。老板就叫我们停下来，但是我们感觉他是忽悠我们的，就不听他讲。他就问我们想怎么样。我们说，搬厂要给我们个交代，要赔钱。

二老板后来说要我们跟着厂走。我们说跟着厂走也要先赔偿。赔了钱，愿意的就去，不愿意的就不去嘛。二老板没有回答我们，进了办公室。

选代表

劳动局的人让我们选代表。第一天我们没选，第二天我们也没选。我们都没有一个代表，哪里有代表啊，应该没一个人敢自己出来代表我们这么多人讲话。选代表要经过我们大家商量的，要经过统一意见才可以选代表。第三天，二老板还是没出来。劳动局、街道办和公安局的人都让我们选代表。

选代表这个事情，我们也有一点怕。因为这里就发生过这样的

事。有一个家私厂要倒闭了，选了一个代表，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，代表就走了，很多人没拿到钱，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。这个厂大部分人 1999 年以前就来这里了，一直在这里。发生这样的事，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的嘛。那个厂里面有很多我的老乡啊。后来都没拿到钱，就是找劳动局补了一个月的工资。他们厂还有一个老大，睡在厂门口都没有拿到钱。所以我们哪里敢选代表，哪里会相信代表嘛。哪一个人能保证老板不会收买代表嘛。

到了第四天还是第五天，他们说：“你们那么多人，我们怎么跟你们商量嘛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不知道你们讲什么。”老板也说都听不清楚我们讲什么。

后来，每个车间都选会讲话一点的，就这样一个一个车间选出来的嘛。选代表的时候都到第三天啦。我的车间选的代表就是我那个老大（组长）。他不愿意当啊，呵呵……我没有选，其他人说让组长去。那些代表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，就知道有两个是老大。

罢工期间点滴

罢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天到晚吃饱了饭，这里坐一堆，那里坐一堆（在厂里）。

守厂都是自愿的。每个部门轮流派人守夜。一个部门守一个晚上。别的部门想来也可以来，不想来可以不来。每天晚上都有 30 多个人吧。守夜的事情不是代表安排的。

有一天保安守在厂里的，他们让我们回去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就那一天我们没有守在工厂里，厂里失火了。

罢工开始到结束，时间太长啦。有一天到厂里，很多人都说，天天这个样，不知道几时是个头。我们就说这里的政府是被老板收

买了，政府是向着有钱人的，所以我们要去市政府里面问嘛。就这样去的。……那些人后来都是被人骂着去的，呵呵……（所有代表都不愿意去吗？）哪里愿意去呀。

去市政府的事情，可以说天天都有人大声叫，看一下有没有人有反应，一有人反应了，就是这样走的。那些人来了又不给我们解决，反正我们没饭吃嘛。有班上的就有饭吃，没班上的就没饭吃。

2004年我就出来打工了，我要送我孩子读书，还要养家。我老公两条腿都不行了，他做工都做不了的。我一个人在外边打工挣钱，送孩子读书，什么都要钱的。罢工那么长时间，我们在这里吃什么？就是这样。反正大家说要去那里（市政府），就都跟着走了，都没怎么商量。

有一天，下好大的雨，我躲在厂里宿舍打牌，呵呵……我就没有看到大老板。就是那一天大老板来厂里的。那一天我们就一直等，到下午2点大老板还没来嘛。我就跟几个工友去宿舍打牌了。后来他们说大老板来了。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大老板，我都不认识。

最后那一天，我去厂里拿钱（工资和赔偿），从写字楼下来，看到一些人围着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有人告诉我是大老板。我就走到他旁边，听见他说对不起我们，他说你们员工是真的好，做事很用心的……我说员工好有什么用，我就一句话顶上来嘛，要老板好……老板是没良心的老板。我就这样讲的嘛。后来那个主管就拉了一下老板，说：“走，我们不理她。”

谈 判

第一次谈判的时候，我们在外边等着的应该都有差不多300人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知道放车的话，我是不会让放走的。我睡都

要睡在厂门口。那么大的一个事情，搞到那个样子了，我肯定要老板一个说法。我们是轮流守那个车的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放走的。其他人有的也说不知道车怎么放走的。

那一天去镇政府，谈判的那些人（代表）出来，说老板愿意赔偿给我们，叫我们先放那些机器走嘛。我记得当时在政府外边，是一个女的（工人代表）说的，先放那两个拖车走。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嘛。我自己就回租住的地方了。我身体不怎么舒服，腰间盘突出，所以第二天去得晚一点。第二天早上，9点多钟我进厂里面，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把车放走了。咦，我说怎么车不见了。我就问他们。他们说放走了。我说那你们死定了，放走了车，老板就不给赔偿的。



代表出来，没有说老板赔多少钱。我们就傻傻的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嘛。要说其他人为什么当时没有反对放车，我就说不上来了，不清楚，呵呵……现在想起来，真的感觉以前好傻，叫回家，我们就回家。到后来，老板讲话都不算数，大老板也不出来了。把拖车放走了，后来老板又把两部小车开走，然后一直都不出来了。后来我们就冒火了，我们就要去政府那个门口那里。

去劳动局那里，有老板请的一个律师在那里谈判。我没有上去，代表们上去谈的。我听他们说跟律师谈了好久谈不成，就让律师打电话给老板，老板就在电话里说他不要这个厂了，工人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律师让老板赶紧过来，说自己上厕所都有工人跟住，洗个手都不自由。后来老板就挂了电话。代表说，老板不要也行，但是要传真一个证明过来，证明你不要这个厂了。老板这个样子，

我们肯定要再去政府问的嘛，因为是政府答应了给解决的嘛，还叫我们放走老板的车。

第一次被抓

在劳动局谈判和去镇政府是同一天。在劳动局谈不成，我们就分开了。我们去政府的时候都5点多钟了。到了那里，他们就把我们全部抓去派出所。

不是代表让我们去政府的。在劳动局谈的时候，代表出来，在楼门口那里，我们就问谈得怎么样嘛。代表把里面谈判情况一五一十地对我们讲了。我们就说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政府都答应我们的，我们现在去问政府。我们一帮人就走了。开始大家都要去，我说，你们全部跟来干吗，在这里看住，不让那个律师走。大家就这样讲，然后一半人就去了政府。代表没有跟我们去政府，都留在劳动局了。

就这样，有的人看住律师和厂里的代表，不让他们走。有的人去找镇政府。

到了政府，我们就坐在门口，要政府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坐了半个小时，6点多钟就把我们抓走了。我就看到很多特警部队在那里，一身衣服都是黑的。有的人是被抬着上车的，（特警）一人抓一边。有些人不走，他就抬嘛。不让抬，他们就抓手抓脚。我说你放手，我不要你抓，我犯什么法了，你要我去哪里。还有人挣扎，他们就用手肘打，就这样被抬上车了。当时有一个女工晕了，送去了医院，住了三天。我也不认识她。

我们全部被抓去公安局里面，就在里面大声吵，大声骂。那个公安局长说，你们吵吵吵，吵什么吵？！我说我们肚子饿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喝水，我们这么多天都没有喝水，没有吃饭。后来他

就给我们一人一瓶矿泉水，后来我们又吃饭。

到了晚上 9 点，局长说要放我们回去。我们不愿意回去嘛，都晚上 11 点多了，我们就想公安局里面有饭吃。他答应第二天早上 9 点来给我们处理，让我们先回去。他说他也要睡觉，不睡觉怎么给我们处理问题。我们就说，你们是用车把我们弄来的，现在要保证我们的安全，还要开车把我们送回去，呵呵呵……是啊，是政府答应了我们，我们才去问的嘛。现在开车抓我们来，肯定要开车送我们回去嘛。他不愿意送，后来我们自己回来了。

劳动局守着律师的那些人，后来没办法，8 点多的时候就把律师放走了。第二天连那个律师都找不到了。

后来，老吴和另外一个代表就过来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被抓，都已经吃过饭了。他们知道我们被抓了，不放心，就过来看一下。老吴说：“大家都回去吧，不要那么麻烦，他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代表叫我们听话，叫我们不要太为难（警察），说警察也是没办法的，他们明天给我们处理，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吧。代表劝我们回来嘛。毕竟他们是我们的代表，我们不愿意也要回来嘛，就是这么样。他是我们的代表，开始信任他，选了他，现在还是要信他的嘛。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，因为他们骗了我们几次了。

如果第二天早上他们有一点诚意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冒火。他说 9 点来谈，结果人都没看见一个，11 点都没有，下午两点钟才有人来。政府一点信用都不讲。我们更冒火了嘛。

下午 2 点，政府，劳动局，公安局，都有人来了。但是谁是谁，我就分不清楚。

就是那样，政府天天来，天天来，老板就不出面。说给我们处理问题，就没有一天是真的处理问题的。他们来了就到上边办公室坐着。有时候就叫代表进去说一下。

关于堵路

我们从来没有堵路，我们就拿着一个横幅游街嘛，从这一边下去，从那一边上。哦，对了，第一次是堵路了，在厂门口。那次我没有跑过去参与，因为我腰痛嘛，我怕万一摔到了，碰到了，我这个腰怎么办呐。很多事情我也参与了，但有时就是远远地看着，呵呵……来了好多警察，他们就把我们往厂里面挤嘛。不知道有



一个人怎么就摔跤了，手断了。警察把她送去医院。然后二老板就出来了，让我们不要堵马路，答应给我们解决。我们又相信一次，又放过他们嘛。堵路不是谁的主意，就是大家在那里讲，天天这样不行……

我们以前看到过（堵路）。有个电子厂，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。那些人就堵马路，一直

堵到万联商场那里。堵了半个小时，那个老板就给钱了。我们都看到过。

我们堵马路的时候，老吴和其他代表都没出来，组长也都没有去。那个路很小的，反正有 10 多个人站在马路上车都不能过去了。

第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以后，我们游行了一次。那次转了一大圈。有三个警察跟着我们走，还有两个当官的。我走着走着就跟警察说我腰痛得走不了，他开个摩托车嘛，我说让我坐一下。他说：“让你坐我就犯法了，谁叫你走的。”我说你们早一点给我们解决问题，我们是不想走的。后来我还给警察开了一句玩笑。我说我们在这里走，还有你们给我们保镖，呵呵……那个警察都要笑了。

代表也问我们的意见。我们就是要老板赔钱嘛。反正那个劳动局的告诉我们有那么多赔，那个是法律规定的，多了我们也不懂。我们全部都是不懂法律的，有的书都没读过的，哪里懂啊，就是知道要钱，就是这么样。反正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，很多人都说不赔就去堵马路。我们不懂法律，一看到人家那样做，我们也就那样做。

第二次被抓

去市政府上访那一天，我刚走到厂门口，看到他们出来，我就跟着去了，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又要去游一圈了嘛。我们走了一段路，看到后面那些人都跟来了。老吴说让我们再等两天，政府说给处理的。哪里还有人听他说啊，都没有人听他说了。大家说罢工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天天在这里等，还等什么，要去市政府上访，这样就走啦。我们还不明白市政府在什么方向，弄不明白。前边带路的人我都不认识。有劳动局，有公安局，那些人都跟着我们走。他们没有拦我们，我也不清楚为什么。

跟我们从厂门口一起走的好像有6个人（政府和公安）。警察叫我们回去。我们不愿意。我们说：“能给我们处理问题就回去，不能处理问题就去市政府上访。”后来他们也没有办法。他们说：“不管什么理由，不能堵马路。”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不是堵马路，我们是在走路。如果有人给我们处理问题，我们就愿意回去；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，就不要出来讲话。刚开始就不是（把整个路都堵住），后来走着走着，走散了，就是了。

有一个三叉路口，具体在哪里我也记不清了，来了一些警察，他们就想把我们走在最前面那些人拦住，不让走了。我们的很多人就要骂了嘛，很多人都要说那些警察了嘛。我们说现在要去市政府

上访，你们拦我们干嘛，你们能给我们处理问题吗？我们就是这样说的。警察没吭声，后来就不拦我们了，一直在旁边跟着我们走。有人在前面给我们照相，一直给我们照。一出厂门口就有人给照相。

我们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不知道走到哪里，就有更多警察出来，把我们全都抓了。警察很多，多得我都数不过来。我们人也多，警察也多。警察还打人。

警察叫我们不要走了，让我们站到路边。他们说让我们站到一边，有人来处理问题。我们不愿意站到路边，他们又用拳头打，又用手肘打，又用脚踢。我哥穿的人字拖掉了，想捡那个鞋子，就被打得腰都痛了。

我们的人全部都哭啦。后来我就一边哭，一边骂。我说：“你们也是妈生的，如果你老妈也在外边打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要怎么样啊？”我就这样说说说。后来有几个警察跟我们一起流泪了，跟我们从厂里走出来的那几个警察哭啦，有一个领子上还有领章的，那人都哭啦。我说：“我们打工也不容易，我们罢工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？我们只想去市政府上访，你们就要对我们拳打脚踢。”

后来他们就开那个大班车来，让我们上车。我说上车就上车，反正我也没犯罪，就是要求给解决问题。我是第一个上车的。一辆车都可以装几十人。每一个座位都有警察站在旁边。

老吴被手铐铐啦，其他人都没有。在车上我们就看到他旁边一边一个人（警察），抓着他的胳膊，手上戴着手铐。我们就在车上大声叫，问他犯了什么法，为什么要用手铐铐他。老吴对我们说没什么事的，他叫我们不用担心他。

在车上我发现不是带我们去市政府，而是掉头沿着我们走过的路往回开。后来我们就在车上骂，骂了一轮，还打电话给我老乡，问他们在哪里，说在另外一部车上。

我们下午两点钟被抓进去，第二天两点钟放出来。审问后，叫我们按手指印，要照相，要去录口供。问我们骂警察没有，我说我骂了。我还反问：“人民警察在哪里？人民警察为人民，那现在你这个警察是为人民还是为老板？我说你们就是为老板的。”我就这样问他。他问我哪个是代表。我说：“哪个是代表啊！？都是你们叫我们



选的，我们都没有代表，要是你们不让我们选，我们哪里会有一个代表，哪一个敢代表我们讲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讲话。”还问了着火的事情。我说：“那天晚上是你们的人在里面，又不是我们的人

在里面。我们哪里知道怎么会着火的。”

后来给我看审讯笔录。反正我怎样讲，他就怎样记的。他没有说不让我看。他还让我看那个照片，问我哪个是代表，我就说不知道。他问我，我就一句不知道。后来有一个警察说我很凶。我就说：“如果你老妈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看你老妈凶不凶。”后来他就没吭声。后来警察说：“看你还算老实，放你出去。”

出来以后

放出来那一天，我没有去厂里，出来了我就回去睡觉。后来哪一天去的厂里，记不得了。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把手机还给我了。

有人第二天放出来后，又去厂里面坐，因为没有拿到钱嘛。有的人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。

放出来后，很多人都怕了。那个秘书就通知，不想做的就辞工走人，想做的就签名继续上班。有的人走了，有的人就一分钱都没有赔到，就是拿了一点工资就走了。有十多个没有拿赔偿就走了。也有的人想签名去上班。被抓进公安局里面一个晚上，很多人都怕了，（所以）很多人拿了工资就走人。

放出来后，我找了一个地方做临时工。有一天，我在那里做临时工，我同事打电话过来，他说你还不过来，大家都拿钱走啦，差你一个人还没签名。我说你给我签一下。是他给我签名的。后来我就赶过去了，拿到工资都到了6点多了。

先放出来的一些人去过公安局，想看看那些没放出来的人，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。公安局连门都不让我们进。我们去了没看到，就回来了。然后我就回老家了，一个月后回来的。

说说我自己

我老家是广西的。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。我小孩子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就来深圳打工，进了一家厂。2007年厂里搞双休，我有三个小孩要读书，双休我就没办法供我孩子读书。我妹妹之前在这里一个市场里卖猪肉。现在我孩子大学读出来了，还没有找到工作。

现在孩子都大了，家里面还没有盖房子，读书借的钱还要还，负担好重。2006年，我家公被蛇咬，医好他都要差不多4000块。医好才半年，又瘫痪了，筷子都拿不起来，又医了半年，一天花100多块，把盖房子的钱，全部都花掉了。后来瘫痪也医好了，自己也能走路了，也能吃饭了，但是过了半年又死了。唉……以前我老公还能做事，靠他一个人赚钱，我在家里服侍家公。家公死了，家婆又傻了，傻了三年。我老公没出来打过工，后来得了风湿病。

离开D厂后，现在我又进了一家厂，工资高一点。以前我还要上12个小时，现在只上11个小时。底薪1600，平时加班12元一



小时，周六日15块钱一小时，住房补贴100元，生活补贴150元，全勤奖50元，全部加起来底薪有1900。厂是新开的，不大，总共十多个人，有三个老板，都是北方人，做五金的。礼拜天不上班，礼拜六就上八个小时。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11个小时。没有社保，什么都没有。每月28号发上个月工资。

“我们以前两次出来，以为这次也没人管”

——田大姐访谈

2010年8月，我第二次进了D厂。之前我进过一次，后来去别的厂打过工。比较而言，附近的厂都不怎么正规，D厂还比较正规，虽然周六不给双倍工资，但平时按劳动法发加班费，一般一天加四个小时，22号左右发工资，一部分打在卡里，过几天再发一次现金。这次我们还在罢工的时候（刚刚月初），老板就把钱全部打到卡上了。这么早发工资的原因，我猜是因为政府验厂的时候，老板都是说每月第一周发工资的，所以这次罢工以后，为了不给政府借口向厂里施加压力，老板就把钱早早打到工人卡上了。

说起这次罢工的代表老吴，老板很早就对他不满。这几年，隔一段时间会有政府的人来验厂。验厂之前，厂里会教大家怎么回答问题，不能讲真话，要说假话。谁被抽到回答问题，只要是说假话，厂里就给200块钱。我们的工资条都是两份，一份是实际发工资的工资条，一份是给验厂的人看的工资条。我们的伙食费每个月要扣300元，不管吃不吃都要扣钱，还不能打包。饭堂的菜也不好，我们打了包带回家去再做个菜不行么，厂里就是不让。有次验厂抽到老吴，他就说了实话，不知道政府有没有罚老板的钱，不过后来就不强扣伙食费了，谁吃饭谁交钱。

因为这件事，老板很生气，就不让老吴加班。后来老板还招童工，老吴去劳动站投诉，老板大概是觉得这么僵持着不好，才又让老吴加班了。

年初，老板在开年搞抽奖的时候，就说会把厂搬到惠州去，希望大家一起过去。结果有些人就辞工走了。厂里本来有1000多人，

后来就剩 400 人了。订单明明很多，但都被弄到惠州去了，也没班加。今年老板已经搬了两次机器，第三次用吊车、平板车搬机器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罢工，要求经济补偿。四楼组长组织大家出去阻止搬机器，一楼的人先去的，三楼四楼的随后下去。老板的秘书从办公室出来，说工厂啤货要从惠州发，所以机器要搬到那边去，让大家让开，别挡着搬机器的车。我们没人听她的。那天有两三个工友去附近劳动站投诉，还有人去市劳动局投诉。劳动局说先让镇劳动部门解决。镇劳动站的人来了，说七嘴八舌的听不清楚，让我们选代表。

当时我们轮流守厂，不让老板把机器搬走。后来劳动局的人给我们保证说不会搬机器之后，我们就不守了。也是巧，那两天工人没守厂，厂里的铁皮房着火了，媒体因为失火的事过来采访，但没理睬工人要赔偿的事。老板也没出现。我们当时议论，说大火都烧不来老板。

谈判的时候，商量好了赔多少钱。我们虽然不懂法，但也听说过别的厂赔偿多少。可是我们老板没良心，就是不赔，还说拿一千万跟我们对着干（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）。

这次罢工时，劳动局的人说：你们老板就是癞皮狗，他不出来谈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；他如果欠你们工资，我们可以找他，但他没欠你们工资，也没离厂赔偿这一说。大家听了这个话不满意，都想去市劳动局上访。因为没钱坐车，只能走过去。老吴也是倒霉，去市劳动局上访的时候，他不想去，就在厂里呆着。后来他觉得大家如果都想去的话，他不去就对不住大家，就跟着去了。

上访的时候，一路上都有派出所的人跟着摄像。如果上访队伍挡路了，派出所的人会叫我们让路，不让的话就硬拖开。路上的车也没有冲我们按喇叭，有些司机还停车录像看热闹，派出所的人不让拍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派出所开始抓人。有的工友跑到厕所去躲着。抓了差不多 180 人，被关在附近的五个派出所。我被关了 24 个

小时，只给了一瓶水，一个面包，在地上睡了一晚。派出所给我录了口供，问谁鼓动工人上街的。我说没人鼓动，我们自己要去的。第二天，我被放出来了。另外十几个工友关了十来天，有两个关了一个月，可是老吴一直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。

我们现在后悔那天真不应该走路去市里，害了老吴。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，一次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几分钟，另一次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，都没人管，以为这次也没人管。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抓人。

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后，厂里贴了通告，说不想干的员工，厂里赔偿每年四百块钱，并且补发前两年的节假日工资，想干的就继续上班。厂里还开除了 24 个人，贴出了名单。所有人的赔偿都一样，但是没有罢工期间的工资。我们想反正要搬厂，现在还有得赔，以后说不定一分钱都没有了，就拿了钱离厂了。有些人回去上班。后来，被关了十几天的人放出来了，他们也拿了相同的赔偿。



几个大姐一起说

罢工以后的一天，我们去劳动局上访。劳动局的人说，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，你们想干嘛就去干嘛（意思是怎么闹都行）。是劳动局的人说我们可以去堵路的。我们真去堵路了，政府就把人抓了，现在都不放。

刚开始不认识老吴，后来罢工了，大家谈的多了，就互相认识了。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，我们都骂他。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。

罢工的时候，我们跟其他厂的员工说我们是D厂的，在争取补偿。他们说，你们搞不过你们老板的，你们老板以前是“出来混”的。听说以前D厂也有过罢工，后来被老板给压下去了。

罢工以后，老板跟我们说不搬了，我们不信。我们说先把我们以前的工龄清了，然后谁想在厂里干，再继续干，不想干的就走，可是老板不同意。机器已经搬了那么多了，我们怎么办？

厂里的律师来了，我们不让他走，我们要求起码一个月1600元的补偿金。律师说他做不了主，让我们找老板。可是你做不了主来这里干什么？后来劳动站的人跟我们打包票，说老板会过来谈，我们才让那个律师走。

罢工最后一天，当时在那个高速路口，我们的上访队伍被特警包围了。我看见有的特警打我的老乡，我就想上去问他们为什么打人。可是我刚想走过去，就被一个特警踢了。

录口供的时候，派出所的人就指着照片问，认不认识这个，认不认识那个，然后就拿着你的手按手印，很霸道的。

1939-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

谢若林

二十世纪初，在欧美资本的扶持下，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，拥有数千家工厂，上百万员工，而市内的繁华地带与多数工业区，位于欧美各国政府控制的“租界”。在二十年代，为了改善生活和维护尊严，上海工人多次掀起罢工运动。一部分最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，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，谋求消灭资产阶级，建立一个工人掌管政权的国家。1927年春，上海工人发动了八十万人的总罢工，一度控制了这座城市，但中外统治者的力量更强，最终把工人压了下去。后来的若干年里，上海工人整体上沉默了，但斗争的传统还在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工人

三十年代，世界经济一直严重萧条，许多国家都酝酿着政治危机和社会风暴。为了摆脱困境，国际列强积极筹划战争，互相抢夺市场和资源。在亚洲，日本统治者试图把中华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。1937年夏，日军攻占了华北、华南，同年秋季，上海沦陷。



战争严重破坏了上海工业，大量工厂关门或迁往日军无法进入的租界重新开工。这段时间里，许多工人失业了。为了保住饭碗，还没失业的工人一般都接受了厂里“时局艰难，工资暂时打折”的决定；如果企业搬往租界，工人也会义务劳动帮忙搬迁。但老板往往另有打算，许多工厂重新开工后，就赶走老员工，另招廉价的新工人，以便降低成本。有些厂被裁掉的老员工集体维权，要求恢复工作、恢复工作前由厂里发生活费、允许住宿舍。在租界当局的配合下，相关企业的老板采取了多种手段对付工人：收买恐吓工人代表、挑拨新老员工的关系、出动警察抓人，把维权工人吓唬住了之后，再给一点补偿打发走人。结果，失业老员工要求复工返岗的斗争，多数都失败了。

战争让工人蒙受了更大的苦难，但也成了上海老板发财的良机。持续的战火，造成进口商品减少、涌入上海的流动资本增多、滞留的大量难民扩大了消费需求，这些因素让 1938-1939 年间的上海工商业，呈现了畸形繁荣。虽然规模减小，但工厂数量比战前更多了，许多厂日夜开工，利润是战前的几倍^①。很多老板赚了钱，又去囤积物资哄抬物价，赚了更多的钱。与春风得意的老板相比，工人的工资赶不上物价，工时延长了，厂里还任意开除看不顺眼的工人，让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气。1939 年，上海工人要求加薪、反对解雇的罢工，迅速增加。这些罢工中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是永安百货罢工和永安纺织三厂罢工。

永安百货罢工

1939 年 12 月 4 日，上海五家最大百货公司的员工，同时要求加薪，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劳资纠纷。五家公司中，实力很强的

^① 比如英资的怡和工厂，1938 年的利润是 1937 年利润的 3 倍。

永安公司，却在12月20日首先同意员工的全部要求，让百货界的老板和工人都大吃一惊。当时，永安老板还一脸诚恳地呼吁“全体职工同舟共济，安心服务”，让工人代表又惊又喜。复工后，工人的几个总代表轻信了公司“同舟共济”的承诺，没有做什么预防老板杀回马枪的准备，比如让部分积极分子隐蔽面目，以防被资方一网打尽。

上海“圣诞节采购”的黄金期过后，永安老板部署停当，开始秋后算账。12月31日，公司首先贴出董事长和租界当局的联名通告，开除了29名工人代表。当天，三百多个员工下班后在商店内全体集合，准备与公司经理展开对话，却遭到警察的殴打，三个总代表也被抓了。第二天，警察冲入永安宿舍，威逼正在商议对策的职工签字复工，遭到拒绝后，就把大家都赶出宿舍，还抓了几十人，有的积极分子被关了一个月。

同时，永安公司收买了上海的主要媒体，扼杀罢工消息的传播。虽然也有一些工厂、商店的职工前往慰问表示支持，但没能帮助罢工集体稳住人心。少数罢工积极分子干着急没办法，只是不断号召大伙跟老板斗到底。公司方面，则出动了各级管理软硬兼施，拉关系讲人情，一周内诱使多数员工复工，发双倍工资，每天下班后安顿在旅馆，好吃好喝，但又严加看管，不许串联。罢工形势急转直下，还在坚持的，是一百多个年轻的实习生，失败只是时间问题。1940年1月16日，这一百多个实习生也被迫复工，公司却要求他们写“悔过书”，逼得许多人当场扔掉工牌离去，资方趁机宣布开除。

33天的“永安斗争”结束了，公司前后开除了150多人，事后经同情工人的社会名流交涉，给了被开除员工一点象征性的补偿^①。永安罢工失败后，其他四家大百货随即跟进，镇压本公司的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，又开除了上百人，并把他们列入上海百货业禁止雇

^① 被解雇员工每人获得20元补偿金，一个半月罢工的工资以及收回在职期间缴纳的人寿保险金。20元大致相当于当时上海普工的月薪。

佣的黑名单。好几年里，黑名单上的工人不得不在其他行业谋生。

永安纺织三厂罢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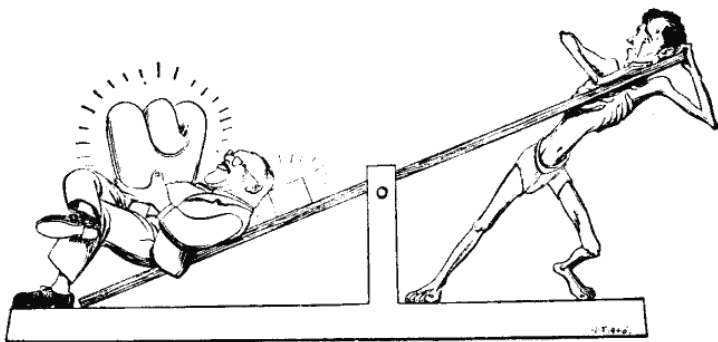
与永安百货一样，位于租界的永安纺织三厂也属于永安财团。1939年这一家工厂的盈利，比战前财团下属各厂的利润总和还多。1939年年底，三厂的工人要求发放年终奖，被厂里拒绝。同年12月12日，全厂三千人在厂内静坐罢工，呼喊要求年终奖的口号。与厂里对话时，工人代表提出“等于双月薪的年奖、增加餐补、不许事后解雇代表”等要求。厂长一口回绝，还说“年奖没有，要三千只麻袋（装工人尸体）就有”。被激怒的工人坚持留厂罢工。次日，租界警察开始驱赶工人离厂，也不许外面给工人送饭。12月15日，工人又饿又累，纷纷回家休息，代表只得在厂里象征性让步的前提下，同意复工^①。

对这次罢工的结果，劳资双方都不满意。工人感到没个组织实在不行，开始摸索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；老板认为自己的让步虽不多，但以后不好管工人了，谋划着找机会把工人打服。1940年2月12日，三厂的一批工人开会商量搞一个“互助会”，却被警察全部抓走。二月底，三厂工人再次罢工，并向租界当局游行请愿，要求释放开会被抓的工友。请愿队伍被租界的骑警队打回厂里，工人又去冲击工厂办公楼，老板立即宣布关厂。过了几天，厂里重新开工时，几乎所有罢工积极分子都被赶出厂了。

1938-1939年间的上海，一边是畸形繁荣的灯红酒绿，一边是贫苦大众流离失所。虽然那两年老板赚了很多钱，似乎有能力给员工改善一下待遇，但外部环境对工人不利：社会整体情绪消沉；租界当局公开迫害罢工；老板抱有赚了就跑的心态，不肯轻易对工人让

^① 厂里同意发放年奖10元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。

步；工人则因为失业太多，不敢轻易跟厂里翻脸。以上种种因素意味着，罢工一旦遭遇态度强硬的老板，就容易失败。



1941年12月，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，占领军以及相关关联的日资财团，强行控制了租界内的大部分企业，从上到下安插了许多日籍管理，让生产直接为日军的作战需求服务。随着战争的扩大，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了，按照租界的官方统计，1941年上海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36年下降了一半。为了一家老小活下去，部分工人不得不硬着头皮站出来，要求企业向工人发放配给米和煤球。斗争的形式，包括不推选代表的“无头请愿”、集体旷工、厂内集体静坐喊“要吃饭！”等口号、工人家属向企业管理“哭诉”家里没米下锅、工人通过基层管理向日方诉苦，不一而足。这些办法取得了一点效果，被几年后的新一轮罢工运动有所沿用。

在日军铁蹄和老板剥削的双重枷锁中，上海工人艰难地活着，为了一把米或几个煤球，费尽了心思……

抗战胜利初期的罢工运动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战败投降，上海人民似乎看到了光明，

对“中央回来了”抱有不小的幻想，既兴奋又期待。那段时间里，在沪日军等待遣返回国，许多企业停产，社会经济生活趋于动荡。上层统治处于半真空状态，让工人有理由也有机会反抗，最开始的行动目标，是争取生活费、“胜利奖金”和建立工会。

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，上海某日资纱厂的工人立即要求管理层发放停产后的生活费，得到了一些大米豆油。随即，许多未停产工厂的工人以“胜利奖金”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，电厂、铁路的员工也为了奖金的事罢过工。8月18日，沪东最大的棉纺织厂成立了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新工会，很快，沪东就有几十个厂建立了工会。在整个上海，1945-1946年间新增了三百多个工会，有组织的工人大大增加了。

几经周折后，沪东各纱厂工人要到了等于一个半月工资的生活费。1945年9月，沪东工人扣押了十三家日资纱厂的高管，又得到一笔相当于三份月薪的生活费。前文提到的永安百货，在长久静默后，也发生了要求加薪、发“胜利金”的工潮。鉴于过去的罢工教训，为了避免被资方“枪打出头鸟”，永安员工写的请愿签名信，集体签名的方式是没有头尾的大圆圈，即签名信的落款处，整体上看起来是个圆圈，避免签名排在前列的员工被当作“挑头闹事者”。这种做法，沿用了抗战时期上海工人的“无头罢工”经验。圆滑的永安老板一看眼前形势不对，立即满足了工人的要求。

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日子，广大工人维权初步顺利，许多老员工不像过去那么怕事了，而经济动荡还在持续。重回上海的国民党当局，忙于瓜分、变卖日本企业或汉奸官员的资财，上千个工厂因设备、原料被接收大员私分而停产^①。接收大员还倒卖稀缺物资，造成物价和房租迅速上涨^②。国民党上层的内部报告也承认，当时的上海

^① 例如，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澎被揭发贪腐，政府调查证明他在上海侵吞、夺占了房产一千栋，汽车八百两，黄金一万多两。

^② 1945年9月到12月，上海物价上涨5倍。

“金融紊乱、物价飞涨、工商停顿、社会混乱、人心惶惶”^①。

相应的，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里，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社会大气氛变了。在上海，重掌权力的国民党官员丑态百出，互相抢夺房子、汽车和舞女，让上海各阶层都忍不住骂起来了。在其它城市，下层、中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愤懑浮出表面，许多人抛开了“不出头”的生存准则，变得关心时事，向政治犯捐款，参加抨击政府的集会，也更同情日益广泛的工人斗争。半年多里，几十万上海工人卷入了上千起劳资纠纷，失业工人要求恢复工作，在职工人要求加薪。1946年初，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员工要求发放等于双月薪的年终奖，遭到资方拒绝后，采取了出车载客不售票的“大请客”斗争方式。政府部门先是派军警到谈判现场恐吓电车工人代表，给代表们上了手铐，威胁抓去坐牢。得到消息的电车工人把军警围了起来，代表也表示决不妥协，政府只好责令老板让步。

来势汹涌的工潮，让老板有点恐慌，要求政府打掉工人维权的势头。在上海，国家很快采取行动，整顿抗战胜利后出现的新工会。

政府着手破坏上海的工人组织

1945年下半年，国民党政府派出负责控制群众的“中央农工部”副部长陆京士到上海，收买、打击工人组织。1946年6月，上海市政府主持下，陆副部长牵头成立了用来操纵工会活动的官方机构“工人福利会”（简称工福会），主张“协调劳资关系，安定生产秩序”，规定1945年以来新建立工会的干部必须参加工福会并接受它的领导，并组建了上万人的武装“护工队”，附属于工福会。“护工队”里有工人，也有流氓，专门帮助老板在厂内监视、恐吓与殴打不听

^① 吴开先、陆京士《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》。

话的工人。

工福会的一个功能，是搜集罢工信息，每天向上海地区党政军机关抄送。它依靠的一部分工会负责人，一般既有国民党党内职务，又是所在企业的管理，通常与特务机关合作，往往也是黑社会成员。这些工会负责人的共同特点，是善于压制、玩弄底层群众。陆副部长利用工福会这个组织，收买、改编了不少抗战胜利后自下而上成立的工会。一时之间，国家似乎稳住了工人运动的局面。

1947 年的阴云

1947 年，共产党在北方农村主持的土地改革，让农民摆脱了地主、商人的地租、高利贷以及附带的人身依附，动摇了剥削阶级的根基。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，妄想摧毁土改成果，维系旧的秩序。很快，国民党控制的地区，由于军费的负担和官员的贪腐，使得经济衰败，物价恶性上涨。

在上海，饥饿的工人要求政府出台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政策。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了，开始根据几种生存必需品（米、煤球、盐、火柴等等）的价格上涨幅度，定期颁布工资相应上调的指导数字。



但一些工人发现官方数字落后于实际情况，要求政府公布编写数字的具体依据，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一句“你们听不懂！”顶了回去。不过，为了安抚工人，有些大厂开始直接发放配给米和煤球，作为工资的搭配。

工人要吃饭，请愿罢工提出涨工资，国家则忙于维护老板的利益。抗战胜利后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经过了一年多的内部协调，上海市各政府部门大体上做到了互相配合，有针对性地推行“谁带头，打掉谁”的反罢工政策，先后破坏了多起罢工，加紧瓦解那些坚持为工人办事的基层工会，不少罢工骨干被捕或逃亡，一批不肯被收买的工会干部，受到政府排挤，靠边站了。最敢于抗争的那部分上海工人，一时间有点懵，有点缩头。

在战火连绵、百业凋敝和苦闷情绪中，上海工人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。生活的压力，还是逼得不少人起来反抗。为了争取年终奖，元旦前后有几十家工厂陆续罢工，有的达到了目标，有的受了挫折。这一轮劳资纠纷中，纺织业的工潮最为醒目。荣氏集团下属的申新第九棉纺厂的工人，逐渐行动起来，并在1948年2月的占领罢工中，

达到了斗争高潮。

申新棉纺九厂工人的斗争

中华民国时期，荣氏集团是全国著名企业，在上海投资棉纺与面粉制造、贸易和银行业，实力雄厚。四十年代，荣氏旗下的“申新九厂”（以下简称申九），成为上海最大的棉纺织厂。抗战期间，九厂和同属荣氏的“申新二厂”生意红火，赚的钱让老板还清了前几年开设分厂欠下的银行贷款。

抗战胜利后，廉价美国棉花涌入中国市场，市面又缺乏布匹，让棉纺老板获得空前的暴利。^①1946年，荣氏所属的各棉纺厂比以往多赚了几倍的钱，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3.7%，其中申九赚的钱是公司其他六个厂盈利的总和。

申九是社会知名的品牌大厂，一直自吹照顾职工福利，办了医院、学校、托儿所，对女工发放产前补贴，还要求工人穿绸料上装，排队上工，媒体也经常吹捧这个“好企业”、“好老板”。但表面光鲜的背后，老板还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。厂内女工申请产假的程序繁琐，休假不易。产后不能轻易请假，否则要退还产前补贴。厂里的“托儿所”，是个仅仅用来供“社会名流”参观，包装企业形象的空壳机构。申九的厂规众多，动辄罚款：做的慢要罚，上厕所超时也要罚，夏天站在窗户边上吹风，也要罚。有的老员工回忆说：“领班罚工钱越厉害，资方就越信任。看见工人做得不对，就罚工钱。普通挡车工人每天只有四毛多的收入，罚工钱最少一毛，往往

^① 例如，小小的纬昌纱厂原本只有纱锭两千枚，1946年底，厂方订购了1.5万枚纱锭，把生产规模扩大了7倍。

是五毛，一元”^①。

多年来，女工为主的申九工人，一直忍受着厂里的高压管理制度，为了生活，并没有特别反抗过。抗战后期，员工往往全家吃饭都只是勉强维持，老板却拿赚的钱炒地皮，也不愿给工人加工资。厂里似乎风平浪静，资方也习惯了工人的逆来顺受。

1946年1月12日，申九厂爆发了短暂的骚动，要求加薪。经政府调解，几天后厂里同意加薪10%，每天的工时限制在10小时，超过的时间另算工资，改善伙食。本次罢工胜利后，其他几家棉纺织厂也跟着罢工，都得到厂里的让步。这些棉纺工人生活改善了，对集体行动的信心大增。

这次工潮，棉纺业众多老板“很好说话”，原因是生意太忙，心疼停工损失。但背地里，荣氏集团也好，其他老板也好，都在加紧勾结政府，企图分化工人。在申九，工福会控制了厂工会，几个工会头头都有特务机关与黑社会背景，老板似乎可以高枕无忧。不过，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拆台的老毛病，使得政府从来无法建立统一听指挥的工会系统。申九工会的主要头目虽然都是工福会的成员，却分成三派争权夺利，全都“上头有人”不好惹，甚至到了互相械斗的地步。工会头目的内讧，客观上让工人维权有机可乘。申九工会中，有一批战斗性很强的工人在活动，他们是本厂工人斗争的中坚力量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，利用合法空间与秘密串联，协助工友争取点滴的改善，让几个工会头目也不敢忽视他们。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的活动，为领导后来的罢工打下了群众基础。

1948年申九大罢工的前夜

^① 1959年1月，申九工人承正安访问记录。

虽然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业普遍衰落了，1947年的上海市棉纺织业利润和营业额，仍然比上一年高了不少。抗战时期，上海棉纺织业形成了给工人发年终奖的惯例。抗战胜利后，许多老板打算取消年终奖，节约成本。1947年底，26家棉纺厂的工会一致要求按上年标准发年终奖。工人只要维持旧例就行，并不想比去年拿的年终奖更多，但在老板眼里，这已经是不识好歹了。1947年12月，棉纺织业同业公会^①公告全市，年终奖分两期打八折，不跟当月生活指数挂钩。棉纺织业区工会的几个主要干部，或被收买，或临场胆怯，在相关协议上签了字。



多年来，荣氏下属各厂一直有年关前裁人的传统，目的是减少发放年终奖。在申九，厂方在1947年年底裁掉了两百多员工，风传将再裁八百人。那一年的下半年，有些厂每月都在发放配给米和煤球，申九这个名声在外的大厂，却自九月起，一直拖着没发，原因是稀缺的煤炭被区一级的工会头目勾结厂里的高管，倒卖给黑市了。工人几次催问，管理层却随口胡说“地里的米还没有收”、“煤在矿井里，还没挖出来”，对工人爱理不理。

申九工人以女工为主体，不多的男工主要是电工和机修。正如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，申九的女工往往比男工负担更重，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更敏感。年终奖的缩水，让她们失望。工会头脑的叛卖，让她们生气。裁人的传闻，让她们恐慌。而答应了的配给米和煤球杳无音信，以及厂里的敷衍、蔑视，让她们发怒了。

与此同时，申九厂长吴士槐向来迷信自己糊弄工人的一套手法，认为女工过去一贯听话，现在也闹不起来，压根没打算向她们让步。

^① 即棉纺商会。

他并不知道在私下里，一部分基层管理（指导员、检查员）为了配给米的问题，已经悄悄倾向工人一边。厂里工人“搞个大行动”的气氛，开始浓厚了。

1948年1月，厂工会突然以“配给登记”为名催促工人上交身份证，实际是为领导官方工会的陆京士副部长参选“立法委员”伪造选票^①。得知真相后，工人的火气更大了，更加渴望“行动”。但如何行动？除了1946年初的那次停工，申九工人并没有什么集体抗争的实践。1月28日，有的男工质问某“考工主任”（即专门在车间监视工人一举一动的管理者）何时发配给米，其他工人立即扔下手里的活，都想听听“主任”怎么回答，车间一时大乱。无论工人是否准备不足，罢工已经箭在弦上了。

恰在此时，对申九工人有一些影响的中共地下组织，认为前一段时间上海工人受了挫，“（斗争）情绪都打消了，比较低落了”^②，需要鼓鼓劲，并选择了申九作为突破口，带动棉纺业的跨厂大联合，争取全额发放年终奖。

一切的刺激因素，都指向了罢工。

申九大罢工、占领工厂与国家镇压

1948年1月30日，从一早上，工人就没心思干活，都在暗中等待着什么。到了中午，管理们去吃饭了，一个男工忽然从铜匠间跑出来，大声喊着“罢工了，罢工了”，随着这两声喊，各车间都动起来了。白班工人全体集合，选出了一百多名代表，在管筒车间召

^① 按照选举规矩，一张身份证可以投一张票。

^② 张祺谈话记录 1981年5月

开大会，提出了如期发放配给品等多项要求^①。罢工由一批事先串联过的男工领导，指挥部设在机器间，组织了纠察队、宣传队甚至歌咏队，各处张贴了“工人联合起来！”“劳工神圣！”等巨幅标语。工人还接管了食堂，煮饭给大家吃。大家不用急着上班，心情好了，排队打餐也不挤来挤去了。指挥部从仓库搬出被管理层克扣隐藏的白米猪肉，做出的饭菜比平时香了很多。

最初，厂方不理罢工的茬儿。到了这一步，工人也不在乎厂里是什么态度了。有些工人躺在布匹上，把筒管做成枕头，嗑瓜子聊天。有些工人太激动了，在车间里乱跑，到处毁坏棉线和线轴。指挥部看到这个情况，派人到各车间，让工人清洁机器，不要胡乱破坏。下午，厂方派保安去宿舍阻拦夜班工人上班，但毫无效果。当天晚上，全厂 7500 名工人聚集在厂内，心情兴奋。

同日晚上九点多钟，上海市劳动部门来了两个人，警告工人“你们罢工是不合法的，没有备案，没有走法律规定的罢工程序！”^②。对这些话，工人根本不理。半夜 12 点，厂方邀请工人代表在厂内俱乐部谈判。工人的谈判代表是四名男工，有共产党员，也有厂工会头目王某。为了保护谈判代表，140 多名工人代表也涌进了会场。资方的首席代表是申九的总工程师，对工人最关心的配给发放，他继续胡诌“无锡的田里，还没有种出米来”。对其它要求，他干脆宣称“要延长产假，我们不成了康复院了，干脆关厂得了！”。

第一次谈判无疾而终，工人继续呆在车间里聊天、玩耍，互相交朋友。有的女工教大家唱歌、演话剧，她们根据流行音乐改编的

^① 这次罢工的要求，说法不一，大致包括按期发配给品、按生活指数发年终奖、补发克扣的工资、延长产假、废除不合理规章、年底开除的工人复工等七八项要求。

^② 申九吴厂长事后讲话，追述说，当时厂方警告工人“你们这次罢工是不合法的，政府规定凡劳资双方有争执时，第一步应呈请社会局调解，调解不成，应请市政府仲裁，仲裁没有结果，可请参议会评断，假使评断不能解决，最后方可罢工……你们这次一步手续都没有做，而且连工会也没有通知就贸然罢工”。

歌曲《你这个坏东西》，很受大家欢迎。

但是，意外发生了。申九罢工发生后，上海爆发了同济大学学潮和失业舞女请愿事件，被上海市政府定性为“暴动”，并决定对申九罢工也予以镇压。中共地下组织原来设想的棉纺织业跨厂行动，并没有得到其他工人的广泛响应，外部形势开始恶化。

2月1日，负有平息上海工潮职责的工福会首脑陆京士，与市警察局多位头目召开秘密会议，部署镇压申九工人。在申九厂内，资方的狗腿子“护工队”不敢公开破坏罢工，就混在工人中传谣，说“不复工全开除！”“共产党捣乱，跟着跑的全抓去坐牢！”一些工人家属在政府部门的挑唆下，到厂门口叫家人出厂，一时人心浮动。同日，罢工指挥部还在按照中共上级的指示，声援学潮和舞女请愿事件。虽然棉纺织工会的几个领导人进厂慰问了工人，但是联合罢工显然遥遥无期。

同日，上海市劳动部门（社会局）和市工会的代表进厂谈判，不了解外部形势变化的劳方代表又加了“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”等要求。社会局的人打着官腔说：“你们要罢工，事先为什么不通知劳动部门？”工人也不客气，回敬说：“通知你们，不是自投罗网么？”看到对方如此强硬，社会局的来人恼羞成怒地说：“你们嫌我们这块榔头太小么？小榔头敲不下来，就用大榔头来敲”。在场的一百多名工人也发火了，喊着“社会局不是人，今天谈不成，不放他们走，打他们”，现场一度失控。

同日傍晚，罢工的核心领导群体开会商议，就是否出厂游行扩大影响，意见分歧相持不下。有人担心继续呆在厂里，工人士气会波动。有人更担心出厂游行，工人会不会直接散掉回家？这次会议没有结果。

同日夜里，厂里想出更多花样折腾工人：叫职业流氓和密探在房顶装鬼叫、丢砖头、敲“花衣箱”，向女厕所投竹片。工人纠察队虽有上千人，奈何女工们的警戒经验实在太少，被搞得一夜疲于奔

命。虽然工人占领了厂区，但还是允许厂方在厂内的招待所请客、开会。从这件事上，当局也看出女工们人数虽多，正面对抗的力量是不足的。政府镇压的准备，逐渐到位了。

2月2日凌晨，上海警方出动一千多警力，包括装甲车和骑警队，把申新厂团团包围，并提前调走了有家属在厂里做工的普陀分局部分警员。同日中午，申九的吴厂长宴请参与谈判的厂工会头目王某，陆京士与警察局长作陪。酒席上，资方给了王某一笔钱，请他配合镇压，定下了“坏人裹挟工友闹事，警方进厂解救工人”的对外宣传调子。



同日下午，王某回到厂内，先是鼓动总代表一起逃跑被拒绝，然后跑到厂房顶上，以工会名义向厂外呼救，声称“我们男工被女工挟持了！我们要出去！”早有准备的警方立即开始破门，剪断工人锁住几道大门的铁链。有的男工开着卡车堵住破门的装甲车，更多的警察蜂拥而入，被屋顶和饭堂的工人用砖瓦痛打。警方以消防水龙和催泪弹驱逐工人，还开了枪。当晚，申九罢工结束了，三名工人被杀，一百多工人受伤，两百多人被抓，三百多人被开除。经过了短促的囚禁和审判，二十六个工人，包括最坚决的几个谈判代表，被判各种徒刑（含无期徒刑）。镇压期间，警方也有三十多人受伤。

尾声：工人、老板与国家的各自反应

罢工被镇压后，法庭上的工人，普通参与者也好，代表也好，普遍保持了尊严，没有向老板和国家“悔过自新”。虽然棉纺业工人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，上海工人是普遍同情申九罢工的，许多人为

受难者捐款、去劳动部门请愿要求放人，或者在各自的工厂举行事件真相报告会。2月22日下午，一批工会组织召开了申九事件全市追悼会，并成立难友后援会。

镇压过后，荣氏集团的大老板们对工人使出怀柔的招数。工厂向受伤和牺牲者发放了丧葬费与赔偿金。拖欠的配给，虽然还是打了折扣，毕竟发下来了，部分被开除的工人恢复了工作。2月25日，申九的吴厂长召集全部男工友训话，大谈劳资是一家人，“家庭以内的事，最好仍由自己解决，不必惊动外人参加”^①，许诺新饭厅、吃饭时加开无线电节目广播以及每周放电影的新福利。

工人的血迹未干，陆京士，这个镇压工人的主要策划者，就换了一副面孔，主持成立“善后委员会”，救济工人家属。他的举动，算是国家软的一手。至于硬的一手，2月8日，上海市政府的内部总结提出“最好暗中逮捕为首者”，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则满不在乎地说“我从来没有尝过枪林弹雨的味道，真是平生第一次开‘洋荤’……但后来知道只死伤六七十个人，并不算多”。在中央，蒋介石接见了劳动部门和特务机关的负责人，就申新罢工的后期处理，指示“共策有效安全措施”，一是在媒体上抹黑罢工，说是少数工人裹挟工友闹事，二是加强镇压有组织工人。

申九罢工，是棉纺工人长期痛苦达到顶点后的产物。这些工人，无论是广大女工，还是承担了指挥责任的一批男工，都没有什么罢工经验，但决心很强，热情很高。申九厂几乎没有过重大的劳资纠纷，那是因为工人能忍。经历了抗战时期的生存磨难，1946年的罢工和加薪，让申九工人刚有点生活好转的感觉，新的恶性通胀，又让大家濒临饥寒交迫，这让多数人实在没法忍了。配给品拖欠等等刺激因素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。

中共上海地下党当时急于寻找工运突破的“契机”，导致缺乏经验的工人陷入盲目，在最后的谈判中还追加要求，这是失败的一个

^① 《纺织周刊》季君勉 1948（1-11期）《申新九厂工潮经过》。

原因。但罢工毕竟来自工人自身的需求，而不是领导者从外部人为炮制的产物。即使没有地下党的安排，这场罢工还是极有可能爆发。

申九厂以及荣氏集团，为何在配给品的问题上，怎么也不肯体谅工人的难处，惹出全厂罢工，还要摆架子、说空话？只能说，因为老板就是靠压榨工人而发财，他们总是能少付给工人一点好处，就尽量少付一点。在罢工爆发后，对荣氏的大老板来说，事情的关键就不再是追究申九管理层是否过去处置失当，而是不能让工人趁势从厂里争得太多的利益。当国家决心粉碎罢工，荣氏老板顺理成章地点了头。至于对受难者的抚恤以及补发配给，无非是有产者惯用的心理战术，舒缓工人的悲愤情绪，以便恢复生产。

假如在谈判中，工人代表的态度更灵活些，争取一点改善后及时复工，是否可以避免流血？或许，这次可以不流血，但无结果的，或成绩微小的妥协，未必能让多数工人平静下来，资方则一定会想办法把让给工人的利益再拿回去，政府一定会追查“黑手”。假设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个半吊子，劳资双方很可能反复摩擦，直到爆发新的大规模罢工。

附录歌曲《我们要配给品》歌词

你，你，你这个坏东西
别人家的配给品都已发
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囤积在家里
只管你发财肥自己
工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！
你这个坏东西，你这个坏东西，坏东西！坏东西！
不发煤球，不发食米，不发豆油，都是你！

你的良心和煤球一样的。

我们车间里，

出汗又出力，

只有你整天享福在家里。

你这个坏东西，

真是要该死！

唉！你这个坏东西！

唉！你真是要该死！

